

蜀志考

蜀志考

蜀志考

著者按：周官五史，小史掌邦国之志，外史掌四方之志，方国有志，自古即然。蜀中古志，从汉至宋，名目可考者，不少于三百种，大都亡佚。现就历代存亡要籍，列举十六类目：

一、八家《蜀本经》

二、赵宁《乡俗记》 来敏《本蜀论》 谯周《三巴记》及《异物志》

三、五家《耆旧传》及《杂记》 陈寿《益部耆旧传》及常宽《续传》 附唐宋传三种

四、王崇《蜀书》、王隐《蜀记》 常宽、杜龚《蜀后志》

五、常璩《华阳国志》 附《蜀李书》

六、任预、李膺《益州记》

七、梁《益地志》六种

八、《文翁学堂图》

九、《蜀地图》

十、古《蜀记》 唐《蜀记》《蜀志》

十一、张周封《华阳风俗录》 释仁显《华阳记》

十二、唐宋《成都记》三种

十三、《成都古今记》五种

十四、宋元明《成都志》 附明总志

十五、《巴郡图经》《蜀郡图经》

十六、山川祠庙志

按类分书，各作叙录，庶能略见蜀志流变之概况。

八家《蜀本纪》

《华阳国志·序志》(以下简称《常志》)云：巴蜀开国，载在书籍，降及汉晋，“司马相如，严君平、扬子云，阳成

子玄，郑伯邑、尹彭城、谯常侍、任给事等，各集传记，以作本纪，略举其余。”后代根据常志，分别著录相如以下《蜀

本纪》八种，谓其体裁兼有“传记”，以成方国之史。但细审常文，“各集传记”是指八家资取之书，“以作本纪”，方是八种《蜀纪》。且常志所谓各作本纪，是因其类别而总称之，非以八书同名《蜀记》。究其实际，八家之书，名目应有不同，分详如后。诸书佚文可考者二，未详者六，下文分别述之。

扬雄《蜀本纪》 雄字子云，成都人，传见《汉书》。雄有《蜀纪》，确载常志，且璩尝“考诸旧纪”，以著《蜀志》。但今见佚文，已非雄著，原书已亡，后人复据常志补撰，来历一一可考。伪补本叙蜀史，起自蠶丛鱼凫，迄于汉宣帝二年，与常氏《蜀志》正同。文近鄙俚，不类扬雄之笔，较之魏晋文字，亦非雅言。案《随书·经籍志》地理类著录“《地理书》一百四十卷，陵澄合《山海经》已来一百六十家，以为此书。见存别部自行者唯四十二家，今列之于上。”所列见存单行四十二家书目中，即有“《蜀王本纪》一卷，扬雄撰。”可据此目以推测伪补雄纪之时，当在晋宋之间，陵澄抄入《地理书》者，已非原著，改称《蜀王本纪》。下至唐人引书，如《史记·夏本纪》《文选·蜀都赋》注，以及两唐经艺志、《通志·艺文略》著录，书名皆同。《太平御觉》卷首列引书目，即分别《蜀王本纪》与《蜀本纪》为二种，前者不著撰人，以示补作，后者题名扬雄，以存旧目。曹学佺《蜀中著作记》六地理类省称为《蜀纪》云：

“《随书经籍志》云汉扬雄撰，载蚕丛以前洪荒之事，下迄西汉。有本纪，有传。常璩李膺多引用之。”此是明人据伪补之书以论原著，谓体分纪传，其实不然。而常志李记所引，亦应有原著与补本之别，常氏犹及见雄书，李时流行为伪纪，不可混同。

近世学者遂因伪书之浅陋，谓雄本无此著，故不见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及本传，而是常志误以汉末托名之书，冒属扬雄。千虑一失，论近武断。古籍不见于书录或本传者，岂只一二，常序并列八纪，岂皆妄言。并推测其为汉末之书，根据亦甚恍惚。常序曾云：“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言”，蚕丛三千岁，鳖灵尸化西上，苌弘血变碧珠，杜宇魄化子鹃。盖“汉末时，汉中祝元灵性滑稽，用州牧刘焉谈调之末，与蜀士燕胥，聊著翰墨，当时以为极欢，后世有以为惑。恐此之类，必起于元灵之由也，惟智者辨其不然。”序中所举荒谬四事，明言是世俗蜀传所载，本非八家之纪，而补撰雄著者，方据常序载入伪本。今遂以伪本为据，谓此书出于刘焉之宾客祝龟，及刘备时之秦宓，而集成于谯周，推之逾远。常志以俗传谬说，恐出元灵戏谈，尚是疑词，今乃指定伪传出于祝龟，是以现见之伪传，冒为已亡之俗傅也。且祝龟所撰为《汉中耆旧传》（见常志《先贤总赞》汉中士女），未作《蜀纪》。秦宓所引《蜀本纪》三事（见《三国志》本传），虽是八

家之书,却非秦宓所作,以宓为撰雄纪之人,尤为不可。至于谯周《蜀本纪》,另是一书,固与雄纪互不相涉。今以三人先后伪造蜀纪,甚为牵强,又谓常志误属扬雄,更难服人之口。

晋以后伪补之雄纪,史家咸多讥评,《史通·因习》云:“国之有伪,其来尚矣,如杜宇称帝,勾践称王。而扬雄撰《蜀记》,子贡著《越绝》(案杨慎《跋越绝》始订正为吴康之作),考斯众作,咸是伪书。”又《外篇·杂记》云:“扬雄晒子长爱奇多杂,然观其《蜀王本纪》,称杜魄化而为鹃,荆尸变而为鳖,其言如是,何其鄙哉。”章宗源《隋经籍志考证》六亦病其语涉怪异,更举武都山精化为女子,朱提男子天降称帝,五丁迎秦女山崩化石,秦襄王时宕渠献长人,皆杜宇鳖令之类也。姚振宗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二十一又为之辩云:“按蜀在同时,称王称帝,故记其事者,相承称为本纪。诸书言扬雄载诸怪异事,多以为讥。今考常璩《序志》,则自司马相如以下八家,皆无是说。旧传扬雄书中属有祝云灵燕胥之语,皆出二人之所起,集矢于子云,非其旧矣。”此即以伪补本为扬雄旧作,唯杂有祝龟戏谈之怪事,近世学者因之,更以扬雄书出自祝撰。

伪本流行于唐宋,历见引录,其后伪本亦亡,王谟《汉唐地理志抄》从《史记》《后汉书》《文选》注、《类聚》《初学》《御览》《广记》四类书及《寰宇记》引

文,辑得十八条。严可均《全汉文》本,博采群书,整理文字,去重补缺,合为二十六条,仍题扬雄,实非原本。再后更有《问经堂丛书》洪颐煊本,如《戎幕闲谈》记李德裕语,《蜀王本纪》中有成都筑城屡坏,依龟行筑之而成一事,严辑未收。又严本秦伐蜀,蜀王开明败走武阳被获条后,另有一条:“《秦惠王本纪》张仪伐蜀,蜀王开明战不胜,为仪所灭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索隐。”注明此条为《史记索隐》所引《秦惠本纪》,本非雄纪之文。严辑稿目抄之,以示上条所出,后刻成书,误此批注之文,为所辑佚文,遂使《秦惠本纪》混为雄记。

谯周《蜀本纪》 周字允南,巴西充国人。仕蜀为光禄大夫,入晋拜骑都尉,见《三国志》本传。常志所称谯常侍之本纪,清人补入蜀晋书目。侯康《补三国艺文志》三云:“谯周《蜀本纪》,《蜀志·秦宓传》注引谯周《蜀本纪》曰禹生于石纽,《先主传》亦引之。其文与扬雄《蜀王本纪》同,则无以定其必为谯书也。”案《蜀志》裴注引谯周书,乃晋宋间人所目见,应无可疑,而伪补本雄纪文同,正袭用谯著,转录自彼。方志抄袭旧著,书异文同,本属习见,不足为奇。又丁国钧《补晋书艺文志》一云:“《蜀本纪》、谯周编年。谨按见《蜀志·秦宓传》注,原本《书钞》一百六乐部引作《蜀王本纪》,王字误衍。”案《北堂书钞》引谯周《蜀王本纪》云:

“武都有人，将其妻子女游蜀，不安水土欲归。蜀王心爱其女留之，乃作《东平之歌》以乐之。”同见《御觉》八八八引扬雄《蜀王本纪》，则《书钞》此条似亦伪纪之文，误题譙周，书名无误。

八家本纪，姚振宗《汉书艺文志拾补》五著录相如、君平、子玄三家《蜀本纪》，《后汉书艺文志》二著录郑廛、尹贡二家，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二十扬雄本纪下附任熙。兹分述六家之书如下：

司马相如字长卿，成都人。生当景武之世，尝以中郎将建节通邛笮，《史》《汉》有传。严遵字君平，成都人。卜筮于市，教授《老子》，扬雄少从游学，传见《汉书·王贡龚鲍传》序。常志《先贤总赞》蜀郡士女但称长卿为“汉辞宗”，君平为“道书之宗”，未载史著，与《序志》互见。隋唐亦无著录，更无佚文。

阳城子玄事迹无考，孙星衍《祠堂书目》始以为即《论衡·超奇篇》之阳城子长，名衡，蜀郡人，当王莽之时。振宗《汉志拾补》云：“阳城子玄始末未详，观常氏《序志》次扬子云之后，则与阳成子长同时。子长名衡，见六艺乐类。”又《隋志考证》扬雄《蜀王本纪》条云：“阳城子玄疑即阳城子长，为莽作《乐经》。”皆从孙说，不知是否。

郑廛见常志《三州士女目录》：“述作，汉中太守郑廛字伯邑，临邛人也。作《耆旧传》。”未举其纪，互见《序志》。

事迹见《先贤总赞》汉中士女段崇传：“段崇字礼高，南郑人。太守河间郑廛命为主簿，永初四年凉州羌反，溢入汉中，从廛屯褒中。廛欲戏，崇谏不可，廛不听，出战败绩。崇与门下吏拥锋战死，羌遂得廛杀之。”叛羌杀廛事，又见《汉中志》总叙，但称“太守郑廛”，不言为河间人。若为河间之人，何得列名三州士女，当是临邛之人甚明，疑段崇传之“河间”二字，为后人窜入。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叙廛事即录自常志，亦不言为河间人可证。姚振宗《后汉·艺志》耆旧传条云：“按范书《西羌传》安帝永初四年春，羌寇褒中，汉中太守郑勤移顿褒中。勤出战大败，主簿段崇门下吏王宗原展，以身捍刃，与勤俱死。盖即此郑廛，《文选·长杨赋》注《古今字诂》曰：“廛今勤字也。《三州女士目》称临邛人，《汉中人士赞》又云太守河间郑廛，则以为河间人。”或又以为临邛郑勤与河间郑勤非同一人，不知常志传本之讹误，多经后人改窜，岂可存误乱真。

尹贡见常氏《南中志》牂柯郡：明章之世，毋敛人尹珍，从汝南许叔重受五经，又师事应世叔，南域始有学焉。”平夷传宝，夜郎尹贡，亦有名德，历尚书郎、长安令、巴郡太守、彭城相，号南中人士。”振宗《后汉艺志》云：“按尹珍为许慎应奉弟子，见范书《西南夷传》。贡与之同时，则桓灵时人也。”贡为牂柯人，所撰乡志，不应是“蜀本纪”，常

志泛称,非其本名。

任熙见常氏《后贤志》:熙字伯远,成都人。世有德彦,察孝廉,除南郑

令,以病去。转梓潼令,辞疾归。太康中除越嵩护军,徵给事中,拜朱提太守,俱不之官。好述作,诗文灿艳。

赵宁《乡俗记》

《蜀中著作记》六:“《乡俗记》后汉(汉中)赵宁撰,《华阳国志》蜀守陈留高联续文翁之后,雅播文教。太尉赵公(瑶)初为九卿,适子宁还蜀,联命为文学,撰《乡俗记》。”案此文引自《蜀志》蜀郡总叙,误以汉中赵瑶为蜀人太尉赵公,因以其子宁为汉中人,非是,文中应删三字。侯康《补后汉书艺文志》三:“赵宁《乡俗记》,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云:太尉赵公初为九卿,适子宁还蜀,太守陈留高联命为文学,撰《乡俗记》。康案:范书《赵典传》载:典父戒及兄子谦,皆为太尉,宁不知为戒子、

为谦子也。《隶释》有《益州太守高联修周公礼殿记》,陈留人,事在初平五年,高联即高联。”案常志《先贤总赞》:赵谦,太尉戒孙,成都人。”初平元年为太尉,“当董卓迁献帝长安时,联为蜀守在初平末,则宁应是谦之子。所撰《乡俗记》,记蜀郡或益州人物。《隋书经籍志》杂传序:“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,故沛、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,鲁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,郡国之书,由是而作。”故知汉以来记乡风郡俗者,实以表彰耆旧名德,褒善劝俗,乃传记之属。

来敏《本蜀论》

《蜀中著作记》六:“《本蜀论》蜀光禄大夫来敏撰,酈道元注《水经》引之。”按《水经注》二十七沔水引石牛开蜀道,三十三江水引鳖令凿巫山二事,《寰宇记》益州亦引自此。侯康《补三国艺文志》三、姚振宗《三国艺文志》二并有著录,康云:“据此两条,则是地理之书也。”地志称论,如魏涿郡卢毓、南

阳何晏并有《冀州论》,俱见《御觉书目》,与此名同。今扬雄《蜀纪》既亡,敏文二则尚存,遂为记古蜀事最早之著。此二条外,《路史·前纪》蜀山氏注有“蜀之为国,肇自人皇”之语。《三国志》本传载:敏字敬达,义阳新野人。初为刘璋宾客,先主署为典学校尉。后主时为虎贲中郎将,累迁光禄大夫。

前后数贬削,皆以语言不节,举动远常。年九十七,景耀中卒。

谯周《三巴记》《异物志》

《隋书·经籍志》地理类著录:“《三巴记》一卷,谯周撰。”两唐经艺志、《通志·艺文略》同。章宗源《隋经籍志考证》略举《玉篇》巴部水如巴字,《艺文类聚》乐部賸民善舞,《御览》人事部巴蔓子事,并出周《三巴记》。佚文尚不止此,姚振宗《三国艺文志》三巴记条:“案《宋书·州郡志》益州巴西郡下亦两引谯周《巴记》。”省称《巴记》者,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注亦屡见之,故沈家本《续汉书志注所引书目》即称谯周《巴记》。顾怀三《补后汉书艺文志》以此书专载地理,题为谯周《巴郡地志》,更改书名,实无依据。又常氏《巴郡士女目录》:后汉上庸太守陈弘、蜀汉越雋太守袭禄,俱出《巴纪》,则是晋蜀郡太守巴西黄容之《梁州巴纪》,见《后贤志》常宽传。《寰宇记》渝州下引《巴中记》,不知是否谯周之书。《舆地纪胜》屡引《巴志》,如涪州沿革叙秦灭巴,皆是常志之文。又于阆州五台山条引《述巴志》,则是《寰宇记》文,书名有误。下至《蜀中方物记》六引《巴志》三峡燕麦,又引《巴南山川记》石蒜,其书晚出,非周旧记。

《文选·蜀都赋》注引谯周《益州记》成者濯锦一事,文同常氏《蜀志》而

稍详,本是《益州记》文,误题谯周。顾怀三《补后汉艺志》五、侯康姚振宗二家《三国艺文志》、丁国钧文廷式秦荣光黄逢元诸人《补晋书艺文志》及章宗源《隋经籍志考证》六,俱以为谯周之书,著录虽多,误出一源,于《文选》旧注,不敢致疑。其实唐人于《益州记》之作者,已不能明,往往臆测姓名,参详后文。

周又有《异物志》一书,《玉海》十六“汉异物志”条云:“《蜀都赋》注引谯周《异物志》”是也。《蜀中著作记》六著录:“《三巴记》《巴中异物志》,并蜀汉谯周撰,《水经注》《寰宇记》多引用之。”书名“中”字,当是“蜀”字之讹。清人著录,或视《异物志》与《巴蜀异物志》为一书,或分为二。章宗源《隋经籍志考证》六于焦周《异物志》外,另列《巴蜀异物志》佚文五事。丁国钧《晋书艺文志》二云:“《异物志》一卷,谯周。谨按见《文选蜀都赋》注”,引涪陵大龟及滇池倒流二事。姚振宗《三国艺文志》二以二书为一云:“谯周《异物志》,案《文选服鸟赋》注、《史记周勃世家》集解、《屈原列传》索隐、《汉书周勃贾谊传》注,并引《巴蜀异物志》,不著撰人,疑即谯氏此书。却未言异名之

故,考汉以来专载方物之书,自杨孚《异物志》后,作者不一,如《吴都赋》注引薛莹《异物志》,《初学记》引孙畅《异物志》,《艺文类聚》引曹叔雅《异物志》,不冠地名,则书易误混,作者难分。故《隋志》著录分别为杨孚《交州异物志》、万震《南州异物志》、朱应《扶南异物志》,及无撰人之《凉州异物

志》。谯志冠以“巴蜀”,应无可疑。又杨慎《滇池序》引《异物志》以释滇池之义,又于《海口修濬碑记》中引《巴蜀志》亦释滇池,并是谯志之文,后者即《巴蜀异物志》之省称,非别有《巴蜀志》一书,更非谯周《三巴记》与《蜀本纪》之合称。

五家《耆旧传》

后汉至魏晋,崇门阀,尚清议,而耆旧风俗之著大兴,一郡之地,即有数书。如陈留有四传:汉袁汤传见《后汉纪》二十一,汉圜称传见《隋书经籍志》、《唐志》作《风俗传》,魏苏林传见《隋志》及两《唐志》,晋陈长文传见文廷式《补晋书艺文志》。晋有荆楚先贤传五种:张方《楚国先贤传赞》见隋唐志,邹闾甫《楚国先贤传》见《郡斋读书志》,高范《荆州先贤传》见两《唐志》,习鑿齿《襄阳耆旧传》及宋郭缘生《武昌先贤传》并见隋唐志。于蜀亦然,常氏《后贤志》陈寿传云:“益州自建武后,蜀郡郑伯邑、太尉赵彦信及汉中陈申伯祝元灵、广汉王文表,皆以博学洽闻,作巴蜀《耆旧传》。寿以为不足经远,乃并巴汉撰为《益部耆旧传》十篇,散骑常侍文立表呈其传,武帝善之。”凡上五种,郑赵王书当称《蜀耆旧传》,陈祝之书当是《汉中耆旧传》,俱限于

本郡,不足经远,唯陈寿併巴蜀汉中人物而广之为《益部耆旧传》,且以“品藻典雅”见称,故寿传行后五传皆亡。

《蜀耆旧传》

常志《三州士女目录》蜀郡郑廩作《耆旧传》,已见前文《本纪》类。《蜀中著作记》六于陈术《耆旧传》下云:“临邛郑廩伯邑亦作《耆旧传》”是也。赵谦之书应是《蜀耆旧传》,事迹附《后汉书·赵典传》:谦字彦信,成都人,赵典之侄,初平为太尉。常志《先贤总赞》及《三州目录》蜀都士女详其世系:成都义士赵定,子太尉厨亭文侯戒字志伯,戒次子国师典字仲经。戒嫡孙太尉郫忠侯谦字彦信,子孙袭厨亭侯;谦弟司徒温字子柔,弟兄皆操道柄,以责董卓李傕。谦子宁作《乡俗记》。谦《传》佚存一则,同见常志《目录》:“侍御史常翊字孟元,江原人。在赵太尉《耆旧传》。”王商见常志《先贤总赞》广

汉士女：商字文表，广汉人。博学多闻，州牧刘璋试守蜀郡，劝璋揽奇拔隼，荐致名士。荆州牧刘表慕名交好。《后汉传》附曾祖王堂传，《三国志》附秦宓传，广汉为三蜀之一郡，商传原名为《蜀耆旧传》或《广汉耆旧传》，则不可知。常志泛称五家之著为“巴蜀《耆旧传》”，各家之书应分冠其郡名，侯康《补后汉书艺文志》三、姚振宗《后汉书艺文志》二著录郑赵王三家书，皆题为《巴蜀耆旧传》，实未究常志之文例，因误以总称为专名。《巴耆旧传》佚文尚存，作者未详。

《汉中耆旧传》

常志《先贤总赞》汉中士女：“陈术字申伯，作《耆旧传》者也。失其行事，历新城、魏兴、上庸三郡太守。”又《三州士女目录》：“陈术字申伯，历三郡太守，见《蜀书》，撰益部《耆旧传》者，右一人刘氏之世。”案常志后条注出陈寿《蜀书》，见《三国志·李譔传》：“时又有汉中陈术，字申伯，亦博学多闻，著《释问》七篇、益部《耆旧传》及《志》，位历三郡太守。”常志以《益部耆旧传》之名，专属陈寿，其余五家泛称“巴蜀《耆旧传》”，故于陈术传但称作《耆旧传》，后条又因《蜀书》称为“益部《耆旧传》”，疑《李譔传》之“益部《耆旧传》，”其益部二字亦是泛稍。若冠以郡名，从其本籍，参证祝龟传名，当是《汉中耆旧传》。佚文一则，见《史记·曆书》：武帝时“巴落下宏运算转曆”条，《集

解》引徐广曰：“陈术云，征士巴郡落下阨也。”汉中传载入巴人，盖古以巴梁同域也。又同篇《索隐》引《益部耆旧传》叙落下阨事云云，此条方是陈寿之传，《文选·公孙宏传赞》注同引可证，决非陈术又传。术之有“益部《志》，”为地理之书。

《蜀中著作记》六从《蜀书》著录陈术《益部耆旧传》，姚振宗《后汉艺志》同，又于《三国艺文志》二详考之云：“陈术《益部耆旧传》二卷，《华阳国志·汉中人士赞》：陈术字申伯，作《耆旧传》者也，历新城魏兴上庸三郡太守。案此三郡，自延康元年七月孟达降魏后，遂为魏地，属荆州，则陈申伯为太守，在献帝时矣。《华阳国志·三州人士目录》：陈术字申伯，历三郡太守，见《蜀书》，撰《益部耆旧传》者。案范书《独行·李业传》云：“光武下诏表其闾，《益部记》载其高节，图画形像。并附传之王皓、王嘉、任永、冯信，此五人当出《益部耆旧传》。”振宗视《李譔传》术书名为《益部耆旧传》，尚犹可说，却注为“二卷”，并以《益部耆旧杂记》之卷数，移于术著，并以《李业传》之《益部记》即术传，合二书为一，近于孟浪。《益部记》载李业事，为《益部耆旧杂记》，非术之书。又谓王皓任永四人俱出《益部耆旧传》，推之愈远，至无边际矣。李业图像事，《玉海》艺文类《文翁学堂图》条注引陈寿《益部耆旧传》：淮南画像于州学，又引范书《李业传》：

《益部记》载其高节，图画形像。二书各别，不容相混。（王刚中《续成都记》载文翁学堂画像百七十三人中有谯周，李业画像应在乡郡。）五人事迹出处，梓潼李业，拒公孙述之聘逼，遂饮药死，墓阙尚存。王皓王嘉皆蜀郡江原节士，不事王莽而归，公孙僭号，二人自杀。任永犍为犍道人，冯信广汉郫人，王莽公孙时，托目盲眇，再征不诣。五人俱载常志，为范书所出，《杂记》有无诸人事迹，不得而知。兹又推及术传，若果名“益部”，固可列三蜀人物，倘是《汉中耆旧传》，则只能收入梓潼李业。

常志《先贤总赞》汉中士女：祝龟字元灵，南郑人。州牧刘焉辟之，授葭萌长。“撰《汉中耆旧传》，以著述终。”祝书标题“汉中”，陈术传名亦当如是。侯康《补后汉书艺文志》、姚振宗《后汉书艺文志》并据常志著录，佚文无考。常氏《序志》谓俗传蜀之怪异四事，恐出元灵宴谈，不应在此传中。

《巴耆旧传》

历代无著录，文存常志，凡二见，作者不详。《巴郡士女目录》：“益州太守李颀字德印，垫江人，见《汉书》及《巴耆旧》。”“度辽将军桂林太守然温，江州人，见《巴耆旧传》。”又《犍为士女目录》：“司隶校尉杨涣字孟文，武阳人，见《犍为耆旧传》。”此传仅见，作者未详。又《蜀郡士女目录》：“侍中常竺字代文，在《耆旧传》。”竺为蜀汉时江

原人，传指陈寿之书。

《益部耆旧杂记》

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有《益州耆旧杂传记》二卷，不著撰人。陈寿于《蜀志·杨戏传》所载《季汉辅臣赞》后附录《益部耆旧杂记》三人，即是此书，省称《益部记》，已见前文。宗宗源《隋经籍志考证》十三从《唐志》著录，又据《蜀志》附录《益部耆旧杂记》以实之，并谓“《初学记》人部张松为小短小二语，称《益部杂记》，省耆旧二字。”所说皆是。沈家本《三国志注所引书目》二云：“《益部耆旧传杂记》，《蜀志》杨洪传、刘焉传、先主传引无“传”字。案《隋志》不著录，《新唐书》杂传记有《益州耆旧杂传记》二卷，当即是书，杂传二字误倒。《杨戏传》末云：《益部耆旧杂记》载王嗣常播卫继三人，皆刘氏王蜀时人，故录于篇。据此则《杂记》在寿之先，故寿得采之，疑即陈术书也。”其以《唐志》书名“州”字为“部”，甚是。又谓“杂传”二字误倒，亦可备一说。至以《杂记》即陈术《益部耆旧传》，误与姚振宗同，实不可信。

侯康尤力主陈术《杂记》之，《补三国艺文志》三云：“陈术《益部耆旧杂传记》二卷，康按：《隋志》有《续益部耆旧传》三卷，《唐志》有《益部耆旧杂传记》二卷，皆无撰人。考《蜀记·李譔传》云：时又有汉中陈术字申伯，亦博学多闻，著《释问》七篇、《益部耆旧传》及《志》，位历三郡太守。《华阳国志·汉

中士女赞》亦同，则此书陈术撰也，《隋志》续字疑衍。《杨戏传》称《益部耆旧杂记》，载王嗣常播卫继三人，刘焉、先主、杨洪、杨戏诸传注，皆引《益部耆旧杂记》，或称《耆旧传杂记》，虽不系以陈术，大约皆陈书。则此画又名《杂记》，《唐志》之名本此也。”此又以蜀陈术《益部耆旧传》、晋常宽《续益部耆旧传》与无名氏之《益部耆旧杂记》，三书合一。常宽《续传》乃续陈寿之书，续字不可去，陈述之《传》是否称《益部耆旧》，尚未敢必，遂指为《杂记》，尤为不可。固疑术著“益部《耆旧传》及《志》”，传当前冠郡名，志为汉中之志，乃地理类之书，必非《杂记》。常氏《序志》尝评蜀人所撰《本纪》《耆旧传》，及《地理志》颇言山水，历代转久，郡县分建，地名改易，于以居然辨物知方，犹未详备。”是以方史、人物、地理三类并举，而其书中，不见前人地理之作，唯此可以当之，益知“志”为地志矣。

陈寿《益部耆旧传》

常氏《后贤志》陈寿传云：寿字承祚，安汉人。少受学于散骑常侍谯周，锐精《史》《汉》。为东观秘书郎、散骑黄门侍郎。大同后察考廉，为本郡中正，“乃并巴汉撰为《益部耆旧传》十篇。”吴平后著《三国志》《古国志》，品藻典雅，班固史迁不足方也。出仕平阳、长广，除中庶子兼散骑常侍。惠帝时，张华表欲登九卿，会受诛，忠贤排摈，寿遂卒洛下。凡所述作二百余篇，

梁益二州先达及华夏文士多为作传。《晋书》本传同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“《益部耆旧传》十四卷，陈长寿撰。”两唐经艺志及《通志·艺文》霸史类俱作陈寿，《隋志》或因传本题为长寿，清人屡加订正。其书似按品藻类目分之，故常志为十篇，为卷十四。

章宗源《隋经籍志考证》十六辨之云：“《唐志》亦作陈寿，《隋志》误作长寿。常璩《西州后贤志》曰：陈寿乃并巴汉撰为《益部耆旧传》十篇。愚案：裴松之颜师古注史，皆引陈寿《益部耆旧传》，其书所载列女，共引十二事。”丁国钧《补晋书艺文志》亦云：“谨按见《隋志》，此书为陈长寿撰，长字当衍。”或以长寿为陈术之字，姚振宗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二十云：“陈长寿即陈寿，案嘉兴沈涛《铜熨斗斋随笔》云：《隋经籍志》、《益部耆旧传》十四卷，陈长寿撰，长寿疑亦术之一字。以此书为汉中陈术字申伯所撰，殊不然也。”又说为陈寿二名，文廷式《补晋书艺文志》二云：“《隋志》题陈长寿，按陈寿《魏名臣奏事》，《隋志》总集类亦题陈长寿，或承祚固有两名欤。”两名之说，欲为《隋志》释疑，恐亦不然。

寿传体例，略见常氏《序志》：“陈君承祚别为《耆旧》，始汉及魏，焕乎可观，然三州土地，不复悉哉。”又《先贤总赞》序云：“自汉兴以来，迄乎魏晋，多士克生，髦俊盖世。故《耆旧》之篇，较美《史》《汉》。而今志州部区别，未

可总而言之。”，由此知陈传断限，“始汉及魏”，然于三州人物，仅详梁益，南中士女，不复悉载。寿之为传，如孔门之四科，以品类为目，凡为十篇，不分地域，旨在品藻，并美《史》《汉》。常志《先贤总赞》以“州郡区别”《三州士女目录》以高尚、德行、文学、政事、节士、匡正等为品类，虽采当时九品荐士之目，亦承陈传之例，又变其例，于州部下再列品类。后世如《世说新语》，以流品分类，正用此法。

是书为人晋后作，吴平后撰成《三国志》，耆旧人物已多收入《蜀志》。再经《华阳国志》《后汉书》所采，三史流行，旧传渐微，然唐时犹存，多见引录。宋时遂亡，后有辑本，《说郛》及《五朝小史》本条目无多，距佚存之文尚远不足，《玉函山房佚书补编》王仁俊补辑，仅得一二。成都国学院曾有辑本，自《三国志》注、《北堂书钞》《艺文类聚》《初学记》《太平御览》及《全蜀艺文志》录出七十条，未为赅备，且有讹误。乡先辈罗元黼先生为之补遗，亦只得七条，并附《杂记》七条，刻于存古书局。尚有待于网罗散佚，订正舛误。

《续益部耆旧传》 常氏《后贤志》常宽传：宽字泰恭，耆族弟。阖门广学，博涉《史》《汉》，强识多闻。州辟主簿、别驾，为侍御史，除繁令，随民安县零陵。湘州叛乱，南入交州，刺史表为长史，固辞。独研精著述，撰《蜀后志》，及《后贤传》续陈寿《耆旧》，作《梁

益篇》。元帝嘉其德行，拜武平太守，在官三年去职，卒于交州。“随民安县零陵”，谓惠帝元康八年李特乱蜀后，宽率繁民东流零陵，因置侨县。兄騫，惠帝时为新都王内史，蜀乱、民流荆湘，徙湘东太守，与之同时。宽著三书，《蜀后志》乃续陈寿《蜀志》，记大同后事，《后贤传》亦续陈寿《耆旧》，记晋人物，《梁益篇》则是地理之书。旧读为“撰《蜀后志》及《后贤传》，续陈寿《耆旧》作《梁益篇》”，语顺而义非。按常氏《后贤志》序，略叙宽传之体例云：“西州自奉圣晋后，俊玮倜傥之士，侔于先贤。会遇丧乱轧遘，华夏颠坠，典籍多缺。族祖武平府君，愍其若斯，乃操简援翰，拾其遗阙。然但言三蜀，巴汉未列，又务在举善，不必珍异。”是宽之《续传》，仅载西蜀三郡耆旧，而不收巴、汉二区诸郡人物，故不得名《梁益篇》甚明。张佳胤《刻华阳国志序》称“常泰恭所为《梁益篇》《蜀后志》《后贤传》三书”，正属地理、方史、人物三类。《蜀中著作记》六于陈寿《耆旧传》下误读为“常宽续《耆旧》作《梁益篇》，又作《后贤传》。”若《续老旧》非《后贤传》，同为人物志，重叠撰述，皆记晋初之人，何从去取，孰为后贤，孰为耆旧，何以区别。秦荣光《补晋书艺文志》二合题为《梁益耆旧传》，又自我作古，擅拟书名。

《隋志》著录《续益部耆旧传》二卷，《通志艺文》作三卷，俱无撰人。《玉海》五十八艺文《益部耆旧传》条，

于陈寿十篇外,并录“《续传》二卷,《蜀志》云:汉中陈术博学多闻,著《益部耆旧》及《志》。”误为陈术之书,清人订为常宽之作,自章宗源《隋志考证》始。姚振宗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二十云:“本志、《唐志》皆列此书于陈寿之后,名之曰续,与《后贤志》常宽撰合,是出于宽为多。宽即常璩所称族祖武平府君者也,所撰《蜀后志》见地理类,是书亦名《梁益篇》云。又案沈氏《铜熨斗斋隋笔》云:隋志《续益部耆旧传》二卷,或即承祚之书。以此书为陈寿撰,则失之愈远。”此辨沈涛之误甚是,然以《续传》亦名《梁益篇》,仍从旧读,义则未安。丁国钧《补晋书艺文志》二著录常宽《续益部耆旧传》云:“《新唐志》有《益州耆旧杂传记》二卷,亦此书也。”斯又逞臆说之,误《续传》即《杂记》,一无所据。当云《后贤传》一名《续传》,常志有“《后贤传》续陈寿《耆旧》”之

语,故又名《续益部耆旧传》。

附唐宋杂传 《寰宇记》怀安军下引阴弘道《益州古老传》一则,又有题为《古老传》因人释地者多则,当是一书。阴传有转引李膺记处,似为唐人之著。然每又题为“故老相传”,则“古老传”不应是传记,乃指传闻之语,遂难明辨。乾道间,蜀人某所编《分门古今类事》中录《耆旧传》八则,或题《蜀耆旧传》,或省称《耆旧传》,或误为《益部耆旧传》,同属一书。所记皆中唐五代异事,至北宋王均之变,是宋时流行蜀中之书,唯未见著录。《方輿胜览》汉州下引《成都耆老传》,《輿地纪胜》省称《耆老传》,所记自蜀五丁、诸葛亮、下至唐五代事,皆乡里琐闻,当是宋人之著。凡此三书,皆继陈寿《耆旧》而作。蒲士龙之《耆旧录》专载顺庆府人物,录汉纪信以下三十六人,并为之赞,则是一郡之书。

《蜀书》 《蜀记》 《蜀后志》

与陈寿《三国蜀志》同记蜀汉之著,有王崇《蜀书》、王隐《蜀记》。续寿《蜀志》以记晋初之书,有常宽杜龚《蜀后志》二种。

王崇《蜀书》

常氏《后贤志》王化传:广汉郫人,王商之孙。“少弟崇,字幼远。学业渊

博,雅性洪粹,蜀时东观郎。大同后,与寿良、李宓、陈寿、李骧、杜烈同入京洛,为二州(当作三州)标隼。著《蜀书》及诗赋之属数十篇,其书与陈寿颇不同。官至上庸、蜀郡太守。”其书未传,不详与寿异处,唯常氏于《刘后主志》未引崇论后主、姜维之女,当出此书。《蜀中著作记》三即据常志著录:

“晋王崇《蜀书》，崇字幼远，梓潼人。学问渊博，蜀亡与陈寿同入京洛，为三川标隽。所著《蜀书》，微与寿不同。仕蜀郡太守，有诗赋名。”

王隐《蜀记》

《旧唐经籍志》著录“删补《蜀记》七卷，王隐撰。”《唐书艺文》《通志艺文》同。章宗源《隋志考证》自《三国志》注检出十条，“并引王隐《蜀记》”，即其原著。丁国钧《补晋艺志》二云：“此去删补，疑后人有益，非隐之原本也。”然自陈寿《蜀志》流行，隐记渐微，补本亦亡，赖裴注陈志，偶存佚文。《御览》一六六引《蜀记》诸葛亮姜维张嶷诸条，实钞自《三国志》注，有混抄正文及注处，并题《蜀记》，乃馆臣录书不严，非当时曾见隐书，别有佚文也。即其所引陈寿《蜀志》亦不尽然，如三三〇兵部引《蜀志》三百余字，记先主伐吴事，实杂揉《吴志·陆逊传》之正文及注而成。

常宽、杜龚《蜀后志》

常氏《后贤志》常宽传：撰《蜀后

志》，时“汉嘉太守蜀郡杜龚敬修，亦著《蜀后志》，及志赵廞李特叛乱之事。”又《大同志》序云：“族祖武平府君、汉嘉杜府君并作《蜀后志》，书其大同、及其丧乱。然逮李氏，未相条贯，又其始末，或有不详。”知二家之志，所记为晋平蜀及蜀中丧乱之事，至于李氏据蜀，则始末未备。

《隋志》地理著录：“《蜀志》一卷，东京武平太守常宽撰。”题省“后”字，章宗源姚振宗《随志考证》、丁国钧《补晋艺志》皆以二书为一。丁云：“宽为蜀郡江原人，卒于晋元帝时。《隋志》东京二字似误。”案书题东京，乃晋室东迁，署以朝代，非冠籍里也。《通志艺文》题《蜀志》一卷，后汉韦宽撰。既误东京为后汉，因讹撰人为韦宽，失之不考。吴士鉴《补晋书艺文志》二又以此书即《梁益篇》，孟浪之至。齐人陆澄合古志百六十家为《地理书》百四十九卷，《隋志》谓“见存别部自行者，唯四十二家”，即有常宽《蜀志》，至隋犹存。书虽早亡，名不可乱。

常璩《华阳国志》

汉后蜀志，各有所专，纪以叙史，志以记地，耆旧载人，《华阳国志》乃总匯于一编，相辅成书，凡十余万言，于是方志之体得备，为今存古志最早创

例之著。作者常璩，字道将，江原士族，仕李势为散骑常侍，传附《晋书》李氏载记。在蜀尝掌著作，故孙盛《魏晋春秋》称为蜀史。入晋秘阁，见《史通·

外篇》。道将《序志》历论旧志,以为各家《本纪》“略举其隅”,分记巴、蜀、汉中,未能兼概三州史事。陈君《耆旧》焕乎可观,“然三州土地,不复悉载”,名标益部,南中未详。“地理志颇言山水,历代转久,郡县分建,地名改易,于以居然辨物知方,犹未详备”,盖详於山川,而略於郡县沿革,各有所缺。曩遭厄运,李氏据蜀,三州倾坠,桑梓荒裔,懼益遐弃,城隍靡闻。“乃考诸旧记,先宿所闻,以著斯篇。又略言公孙述、《蜀书》、咸熙以来丧乱之事,约取《耆旧》士女英彦。肇自开辟,终乎永和三年,凡十篇,号曰《华阳国记》。”其书分为巴、汉中、蜀、南中四地志,公孙述及刘二牧,刘二主、大同、李氏五史志,先贤总赞(上中下)、后贤志、三州士女目录三人物志,集古蜀志之大成,共十二卷。序称十篇,因《李氏志》原为《蜀李书》,本自单行,未计在内;又《三州士女目录》总括先贤,后贤二志,并补事迹不详者,匯于一编,似为后来所增附,故只十篇。初名《华阳国记》,《水经》漾沫二水注引书名同,江水注省称《华阳记》。后增补为十二篇,改题《华阳国志》,序文仍旧。

崔鸿《十六国春秋·蜀录》云:“常璩字道将,蜀成都人。少好学,著《华阳国志》十篇,序开闢以来,迄于李势,皆有条理云。”此专就蜀史言之,尤有取于李氏诸志。李奎《华阳国志序》称其“部分区别,各有条理,其指归有三

焉。首述巴蜀汉中南中之风土,次列公孙述刘二牧刘二主之兴废,及晋太康之混一,以迄于特、雄、寿、势之僭窃。继之以两汉以来先后贤人,梁益宁三州士女总赞,序志终焉。”此分三类而言之,其地理四志为乡土记,所以辨物知方,尤寄情于桑梓。《史通·杂述》云:“史氏流别,殊途并鹜,推而为论,其流有十焉。九曰地理书,九州土字,万国山川,物产殊宜,风化异俗,如各志其本国,足以明此一方。若盛弘之《荆州记》、常璩《华阳国志》、辛氏《三秦》、罗含《湘中》,此之谓地理书者也。”其蜀史五志,寓治乱存亡之理,劝懲善恶,以为鉴戒。章学诚《史考释例》云:“《华阳国志》上起鱼凫蚕丛,中包汉末公孙述二刘蜀汉,下及李氏父子,非为一国记载,又非地志图经,入于霸国固非,入于地理尤非。斯乃杂史支流,限于方隅者耳。”其人物三志,仰止高轨,载其言行,为世师表。李奎序云:“就其三者之意,于一方人物,尤致深意。虽侏离之氓,贱俚之妇,苟有可取,在所不弃。此尤足以弘宣风教,使善恶知所懲劝,岂但屑屑于山川物产,以资广见异闻而已乎。”凡此三类,较之旧志,各有所承,又从而大之。

乡土四志,前有诸家《蜀本纪》、来敏《本蜀论》、谯周《三巴记》、陈术《汉中志》、黄容《梁州巴纪》及族祖常宽之《梁益篇》,南中则有杨佟《哀牢传》、魏完《南中志》,皆可资取,又益以先宿所

传,自身见闻,正误补失。此四志即《序志》所云:“乃考诸旧记,先宿所传,并南裔志,验以《汉书》,取其近是,及自所闻。”四志列载三州三十三郡百八十县,即仿《汉书地志》,参合晋制,按郡县分划。《后汉郡国志》谓:班志“记天下郡县本末,及山川奇异风俗,所由至矣。”后世地志皆从其例,而常志记叙特详,凡疆域建置,郡县沿革、天象祥异、山川形胜、道里津梁、河流渠堰、城池坊镇、边防关塞、苑囿祠祀,官学典礼、仓储赋役,物产工商、族类姓氏、师官仙道、户口风俗、方伎选举、艺文金石,无不备载,每一郡内,有则书之。综计种族即有三十余类,为他书所无,而又反覆于一郡之官师士女、兵政巨变,尤为前志所略。盖《禹贡》以自然区域为主,记其山川贡赋,不及人物,《汉志》以行政区域为主,详共疆域建置、山川巨浸,不载人事。虽有地志偶涉方史耆旧,条例不密,常志则兼而备之。进而论之,昔人谓班志首创,精赅罕俦,而常志变例,体备众类,则其有功地理之学,正不以方志为限。唐宋地志,即因其例,至《太平寰宇记》每郡必详方輿建置、疆域山川、名胜物产、乡邑土风,以及官师人物、金石艺文,为郡国图经、天下统志所沿用,莫不昉于常志。或讥其志,时有荒怪,此乃信以传信,疑以传疑,乡故传闻,不妨略载,后世博征旧记,足广见闻,固不必责之矣。

霸史五志,前亦有著,公孙述事载《东观汉记》及晋诸家《后汉书》,刘二牧、蜀二主载陈寿王崇之《蜀书》,大同以后亦有常宽杜龚之《蜀后志》,李氏四世则先有其《汉之书》。《序志》自谓,取之旧史,参合纪传,加以融裁。纪年或异《史》《汉》,犹史迁《六国表》与诸《世家》异同互存。所撰《汉之书》十卷,纳入全志,亦有削剪,仅容一卷。至于晋室乱离,三州流荡,狂狡弄兵,边夷作祸,事迹本末,前史所无,虽属方乘,实备国史,故自《晋书》载记、《通鉴》记事,皆资取焉。道将身历丧乱,楼迟江左,故都乔木,情寄笔端,读之自觉其一往遥深也。

人物三篇,前有《蜀耆旧传》《巴耆旧传》及《汉中耆旧》之著,而总匯于陈寿《益部耆旧》,继有常宽续成之《蜀后传》。常志先贤,“约取《耆旧》士女英彦”,后贤就其家稿“撰次损益”。《先贤士女总赞》初名《先贤志》,实仿杨戏《季汉辅臣赞》例,以赞为主,注其生平。后改名《总赞》,按州郡区别,以系六郡士女,品题斐然。故《史通·补注》称:“常璩之《华阳士女》,文言美辞,列于章句,委曲叙事,存于细书。”吕大防《华阳国志序》亦谓:“于一方人物,丁寧反覆,如恐有遗。虽蛮髦之民,井臼之妇,苟有可纪,皆著于书。自先贤至晋初,踰四百岁,士女可观者四百人,亦可谓众矣。《蜀纪》之可观,未有过于此者。”先后贤二志外,意犹未足,更

为《梁益宁三州士女目录》，总而赞之，首选德行、节士、政事、文学，列女必以贞孝节烈四科，足传于世，可以稽古。

唐宋著录，《隋志》霸史为十二卷，与传本合。《旧唐经志》作三卷，丁国钧《补晋书艺文志》四云：“三上夺十字。”《新唐艺志》伪史类作十三卷，似分《序志》与《士女目录》各为一卷。宋人目录尤为纷歧，《崇文总目》伪史类讹为十五，《直斋书录》又讹为二十，姚振宗云“二十盖十二之误”。《玉海》艺文引《中兴书目》作十卷，或因《序志》之篇数，唯《郡斋书志》伪史、《通志艺文》霸史作十二。《宋史艺志》霸史别史重载，一作十二，一作十一，周中孚《郑堂读书记》二十六云：“《隋志》《读书志》《书录解题》《通考》俱作十二卷，《旧唐志》作三卷，《唐志》作十三卷，《宋史》别史类作十一卷，大都作十二卷者是，余俱传写误也。”

璩书成后，传写流布，素为史家所重，凡涉益部者，无不稽考其著，不独巴蜀南中赖以存其古史，而更详于《史》《汉》。《后汉》《晋书》，往往采之，唐人注史，广为征引。地理之书，资取尤多，自酈注《水经》，下至宋卜舆地，每引其说。然因转录之误，后世传写，乃援以窜改本书，遂无善本。如酈注误天彭阙于湔氏县，置江原文并江于临邛，以沫水入青衣于汉嘉，皆以为误由常志，聚讼不已。兼之传本文字脱讹，校改纷乱，遍体鳞伤，读之为难。

宋以来传本，皆出于元丰间吕大防成都郡斋刻本，嘉泰初李奎重利于临邛，已患书多阙缺，因摭史传，相互参订，以正其先后失序，本末舛逆，词旨重复，句读错杂。自谓于讹谬无所考据，则亦不敢臆决，阙之以俟能者，故虽经校改，讹误犹难通读。据其《李氏志》后记云：“诸本无李势志，‘今本诸《通鉴》所述，参以《载记》所书，续成《势志》，用补其阙。’”则传本卷八建元元年以下叙李势约五百字，为奎所补。迄于明初，其书若亡，故彭韶正德《四川成都志》序谓：“成都古有《华阳国志》，久而失传。”至嘉靖后，方有两刻本及钞本传世。一为杨慎校本，慎尝单刻《南中志》于滇中，《四库总目》以为慎所伪托，失之未考。慎没后书归妹婿刘大昌，嘉靖四十二年刻于成都，刘序称：兹编旧录，间有疑误，尝参互考订，稽之范史列传，并注中引书，幸获什一，缺者仍旧。而考订校勘，实出慎手。从刘本出者，传万历间有何宇订本，又有天启李一公翻刻本，讹误滋增。二为张佳胤校本，与刘本同年刻于蒲州，张序云：旧得钞本，缺脱十五，后在江阳，因杨用修所藏旧本，录之篋中。传沅叔尝对核二本，“凡刘刻改正之字，张本一一皆具”。是张本亦出自杨校，来历甚明。书经佳胤之手，曾加编纂，如移先贤士女诸赞于卷首，以当目录，另撰《江原常氏士女目录》，附于书末，又志传各卷，偶有注语。唯

刘张二本并缺《巴郡士女》传赞,明清传刻,多出张本,此郡俱缺。而吴瑄《古今逸史》、何鏗《汉魏丛书》又缺张本固有之蜀、广汉、犍为三郡士女,卷八亦缺数页,流行最广,清人称为“俗刻”是也。三为缪荃荪藏钱穀隆庆前钞本,亦缺巴郡人物,盖与杨慎旧藏,同出李奎刻本。又有孙星衍所得季苍苇景写宋本,更缺四至六卷,乃属残本。又有何焯批校本,或据其讳字,谓出北宋吕大防本,不知然否,却无巴郡士女,未知何故。

乾隆间,李调元得丁小山所贻惠栋旧藏钞校钱穀本,因取刘大昌李一公吴瑄何鏗四本合校,详勘异同。时虽未见张佳胤本,而吴何本即从张出,是李校已集钱刘张三本于一编,刻于《函海》。自诩“偏傍字画悉照丹稜李氏宋本,不妄改一字。”力图能复宋本之原貌,亦偶有意改之处。清人校勘此书,尚有数稿,唯二顾之书最著。嘉庆间,邻水廖寅托顾广圻校理,博采史传类书,参订讹误,重在人物,虽有《补三州郡县目录》,而地理四志,力所不及。刻为题襟馆本,序称可复常氏旧观,有过李奎删改。然廖刻底本,实为《古今逸史》,舛误盈幅,校难尽善。传沅叔取与《函海》比勘,转不若李刻之较为审慎精严,戒人切勿笃信名家校刊之书,诚为名言。虽然,顾校之功,亦不可没。道咸间,顾观光据题襟馆本再校,多所是正,合二顾之功,常志

差可句读矣。观光尝辑得《巴郡士女》七人,其后缪荃荪又再辑之,略可补缺。近人为之校注,有繁简二本,繁本搜罗众籍,用力至勤,每于要事,好逞奇说,瑜为瑕掩,简本校注,不免雷同,简要清晰,适可并行。至于注而增误,地理尤多,不可意料,董理之难,固鲜有能奏全功者。

附《蜀李书》《北史·崔鸿传》载:撰为《十六国春秋》,勒成百卷,又恐识者责之,未敢出行于外。宣武闻其撰录,诏可随成者送至觉之。鸿以其书,有与国初相涉,言多失体,乃妄表曰:“始自景明之初,搜集诸国旧史,暨正始无年,写乃向备,至三年来,草成九十五卷。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据蜀时书,寻访不获,所以未及缮成。辍笔私求,七载于今,此书本江南撰录,恐中国所无,非臣私力所能终得。”鸿歿,子子元于永安中奏其父书,称“先朝之日,草构悉了,唯有李雄《蜀书》搜索未获,阙兹一国,迟留未成。去正光三年,购访始得,讨论适讫,而先臣弃世。”同见《魏书》本传。鸿以涉讳,书讫不奏,托言未得《蜀书》,其子又言正光时购得,亦为托词,距正始已十余年。鸿称“李雄父子据蜀时书”,即《蜀李书》,在蜀已成,本自单行,流传中原,归晋以后,“江南撰录”,则经改写。《颜氏家训·书证篇》:“《李蜀书》一名《汉之书》云:姓范名长生,自称蜀才。南方以晋渡江后,北间传记皆名伪书,

不肯省读,故不见也。”东晋士大夫视《汉之书》为北方传记,其流行北朝可知。后入江南,改称《蜀李书》,又加删节,纳入《华阳国记》,订成《华阳国志》,鸿亦见之,载入其《蜀录》。

李氏建国,初号大成,李势改号为汉。常氏仕蜀时撰史,当以国号称《汉之书》,归晋后去其僭号为《蜀李书》,并补至李势亡国,故前后异名。《经典释文叙录》引“《蜀李书》:姓范名长生,一名贤。隐居青城山,自号蜀才,李雄以为丞相。”与之推所引同,汤球《三古国春秋》辑本仅得佚文七事。《旧唐经志》著录《蜀李书》只九卷,《隋志》霸史类为“《汉之书》十卷,常璩”,名从旧本,卷帙稍多。《新唐艺志》并录《蜀李书》九卷,《汉之书》十卷。《通志艺文》

亦录“《汉之书》十卷,常璩撰。《李雄据蜀书》九卷,一名《蜀李书》,常璩撰。”后少一卷,自是入晋后删裁其不便之处。《史通·外篇》云:“李势散骑常侍常璩,撰《汉书》十卷,后入晋秘阁,改为《蜀李书》。”正合常理,先题国号,后贬称其姓,未可以卷帙多少计其先后。《蜀中著作记》三据崔鸿《十六国春秋表》文称《李雄据蜀书》,名同《通志》。又《隋志》于《华阳国志》下附注“梁有《蜀平记》十卷,《蜀汉伪官故事》一卷,亡。”亦关李氏之书,梁时犹存,作者未详,曹氏《著作记》以《伐蜀记》为桓温平李势后作。刘大昌《华阳国志后序》误归常氏:“生平著作,有《汉之书》《蜀平记》《蜀汉故事》,三书散逸。”

《益州记》

秦并天下,因巴蜀故国,分立二郡。刘邦入关,汉中巴蜀为其封国,汉袭秦制,仍置三郡。高帝六年始分蜀郡置广汉郡,武帝建元六年分巴蜀置犍为郡,习称“三蜀”。元鼎六年分蜀西南置越嶲郡,分犍为南置牂柯郡,元封二年又分牂柯西置益州郡。元封五年天下分置十三部刺史,益州即统此八郡。至成帝末,罢刺史,置州牧,方改监察为政区。后世相沿,以益州为统部之称,方志亦以为总志之名。

任豫《益州记》 旧无著录,清章宗源《隋经籍志考证》六据《续汉书郡国志》注、《文选·蜀都赋》注、《艺文类聚》礼部、《初学记》地部、《御觉》地部“并引任豫《益州记》”,始录此书。又考《史记·河渠书》二江条注、《北堂书钞》酒食部卓王孙井条“并引杜豫《益州记》。杜豫任豫字形相近易讹,自是一书,”所说甚是。文廷式《补晋书艺文志》二“樵周益州记”条亦云:“案《寰宇记》《太平御觉》有引杜豫《益州记》”

者,皆任豫之讹,今不取。”或又疑无任豫记者,沈家本《续汉书志注所引书目》二“任豫益州记”条,以《隋志》《新唐志》并作李氏,“均无任豫书”。意以任记即李记,是因随唐志题名,而疑诸书所引任记皆误。案自《水经注》以下,唐宋诸书并引任起,迄至《御觉书目》明标“任豫益州记”,书中即有引文七条,近至《说郛》尚存任记一卷十五条。凡此皆彰彰在目,何得尽归李记,无乃以一废十。唯任豫生平不显,《隋志》有宋太尉参军任豫《礼论条牒》十卷,知为晋宋间人。慧皎《高僧传》七慧严传载:何承天问佛国历法,“帝敕任豫受焉。”姚振宗《隋志考证》礼论条云:“所撰别有《益州记》,疑是蜀人。其为太尉参军,或当在晋义熙中宋武帝为太尉时。其时何承天亦为宋武太尉行参军,与之同时。”

李膺《益州记》《隋书经籍志》著录“《益州记》三卷,李氏撰。”宋多引文,皆题李膺记,书载本传,当是膺作无疑。是书为六朝蜀志之要籍,于獠人陷蜀,州县侨置,成都古迹,天彭所在,二江之分,皂江之支,皆前人所未详。宋后书亡,章宗源《隋志考证》尝从《后汉书》公孙述、西南夷二传注,及《元和郡县志》《太平御觉》录出数条,而唐时类书、宋人地理所引,远不止此。宗源又检《水经》江水青衣水若水注引《益州记》,未冠姓名,难别其撰人。姚振宗云:“案郾李异地同时,此

所引自是别家《益州记》。”考《水经注》引记,皆任氏之书,此谓“别家”,当属任豫。

《梁书·刘季连传》:齐月帝永元二年,雍道晞率贼逼巴西,涪令李膺破斩之。《南史·邓元起传》:梁武起兵,中兴元年以元起为益州刺史入蜀。至巴西,军粮乏绝,欲罚巴西山民,涪令李膺谏之,率富人上军资米三万斛。又附《李膺传》云:“膺字公胤,有才辩。西昌侯藻(案萧藻代元起)为益州,以为主簿,使至都,武帝悦之(以上又见《能改斋漫录》十四即用史文),乃以为益州别驾。著《益州记》三卷行于世。”其记獠陷蒙山,有“永嘉分崩,李雄窃据,蜀地芜废,将二十纪”句。自永嘉元年至太清元年恰二十纪,则其成书,适在梁武末年。《御觉》二六五职官部引《三国典略》记李膺事,与本传同,称之为“梁李膺字公胤广汉人”(又《御觉》二六三亦记其事,文同《典略》,误题《魏志》)。《太平寰宇记》载其事三条,七十二蜀郡成都府:“李膺宅在府西三里,或云是姜维宅。”或又谓记所指宅,传为汉蜀郡太守李膺,未知属谁。八十三绵州人物:“李膺涪城人,撰《益州记》三卷。”膺广汉人,梁郡治雒人。此云涪人,梁巴西郡治,即今绵阳,误以涪令为涪人。又绵州彰明县云:“李膺墓在州西南四十里,膺涪城人,为益州大中正,撰《益州记》三卷。”绵州西南不属彰明,“州”字当是“县”

之讹。膺为益州别驾,此云大正中,或是先后职异。清修《彰明县志》四十九陵墓:“汉李膺墓,县西北三十里石马山荒谷中。《寰宇记》在绵州西南四十里,膺涪城人,为益州太守,即作《益州记》者。父老相传,旧时石马山荒谷中有巨碑,隶书汉校尉李元礼之墓八字。《绵志》所载,似系南北朝之李膺墓,故在绵之西南。”此又强分为汉梁二李膺墓,乃乡人好事,父老相传,本出附会。汉李膺虽尝补蜀郡,州纪其正文化,终死于诏狱,妻子徙边,何能葬于蜀中。盖误自明人,传于众口,遂以梁人为汉人。滇中亦传,旧有膺墓,程封《滇补·李元礼碑辨》云:“考《皇舆考》曲靖府南有李元礼碑,相传李膺以党锢流妻子于此,似与本传妻子徙边之说相合。今曲靖郡县官,每逢春必致祭石婆婆者,即元礼碑也。去城南一里许,在山阜上,一石峭立如壁,高可五六尺,向四刻篆字,旧有人辨云,汉元和五年闰四月十五日李元礼等字。”俱不可信,公胤之墓即在彰明石马山,今江油境内。《舆地纪胜》一六四怀安军:“李膺冢,后周金水县令李膺冢在金水县北十五里,为令有惠受,祭祀不绝。”后周李膺,另是一人。

《蜀中广记》数记公胤事,参差不一。《人物记》六朝:“李膺字公辅,梓潼人。”以下用《南史》传文,末云梁武嘉之,擢益州别驾,仕至太仆卿。此误梓潼人,案《魏书》李苗,梓潼涪人,父

膺箫衍太仆卿。曹记乃混梓潼太仆卿于广汉李膺,似因汉广汉郡治在梓潼故。《卮林》五尝考梁有两李膺,《王僧辨传》为元帝主书者,是梓潼李膺。《名胜记》彰明县:“《胜览》云彰明县有李膺墓,西南去州四十里。按膺涪城人,梁时为益州大中正,即撰《益州记》者。”又《著作记》六:“《益州记》二卷,梁太仆卿涪城李膺公辅撰,时为本州别驾,乐史《寰宇记》常引用之。按公辅一作公胤。”《诗话记》则云:“两李膺,晋李膺涪城人,作《益州记》者。汉李膺为益州太守,《寰宇记》云城西三里有李膺宅。”案《广记》成于众手,来源不一,故四分记中,于膺之时代、字号、籍里、职官,各持一说。其以“汉李膺为益州太守”,滇人又误以益州为益州郡,谓墓在其境,方志之妄传,淆乱国史。

李充《益州记》唐人于李膺《益州记》之作者,不甚明悉,故《隋志》只称李氏,《唐志》意补为李充。《旧唐经籍志》作李克《益州记》三卷,《新唐艺文志》《通志艺文略》皆改李充。《玉海》十五唐《华阳风俗录》条亦云:“李充《益州记》三卷”,从《新志》以改《旧志》李克之误。然历考唐宋引《益州记》,未有题李充者,故章宗源《隋志考证》以“李氏”为李膺,谓“《唐志》作李充误”,是也。窃更以为《旧唐志》之李克,史无其人,原亦作充,乃传刻之讹,非题名之误,李充见《华阳国志·先贤

志》广汉士女：“李尤字伯仁，雒人。侍人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才，明帝召作赋铭，拜谏大夫，后与刘珍共撰《汉记》。孙充，有文才。”又《三州士女目录》称尚书郎李充，尤孙也。李尤与刘珍等共撰《东观汉记》，《唐志》因以《益州记》归充，乃意拟之，本无确据。《隋志》著录晋著作郎李充注《论语》十卷，有集二十二卷，又尝补荀勖《新簿》四部书目，未有《益州》之著。

本编所辑任李二记，共一百六十余条。膺记多存于《初学记》《御览》《寰宇记》中，宋初犹能见其书。迨至南宋，似已亡佚，故《与地纪胜》北阴平郡条，乃录自唐人之文。明人转引，讹误滋增，《成都记》江出羊膊，常志李冰誓水，岑参《招北客文》笮桥悬度，阴私道《益州古老传》李八百栖贤山，王隐《蜀记》李密之子，《纪胜》峨眉龙门山，《寰宇》万安故城及梓州桃花水，皆改题《益州记》，不便剔除，录以存疑。又有唐人之书而冠以李膺名者，《蜀志》杜宇鳖灵、《华阳记》开明七宝楼、《治水记》李冰擒鼉，《蜀记》玄武盐亭七事，皆非膺著而误归之。《蜀记》玄武犁刀山更臆改书为《益州记》。纷乱如此，皆当订正。至于著录之误，竟有八家《益州记》之多，杜预李充之讹，已详

上文，兹别述四家如下。

王褒譙周陈术刘欣期《益州记》

王褒《益州记》见《寰宇记》相如宅条，本任预之书，方志误题子渊，乐史据以录之，为《千顷堂书目》所收，实无此书。譙周记出《文选·蜀都赋》注成都濯锦条，为唐人所误题，正犹《唐志》之作李充，俱以意补名。《蜀中著作记》六李膺《益州记》条云：“先是譙周、任豫、刘欣期各有《益州记》，散见类书。”曹记亦从《文选》注来，非别有据。刘欣期记见《升庵外集》九十七引刘欣期《益州记》：“蒙童，水鸟，黄喙、长丈馀，南人以为酒器。”文称“南人”，或出《交州记》，升庵记忆误为“益州”，曹记遂据杨误著录，盲从失考。陈术记则出姚振宗之误测，《三国艺文志》二陈术《益部耆旧传》条：“又考史称（案指《三国志·李撰》）术著《益部耆旧传》及《志》，则所作尚有《益州记》，今不可考。”术《志》史未举名，当是汉中地志，已详前说，兹以为《益州记》，穿凿之至。

要之，《益州记》唯任李二家书，佚文尚存。其余王褒李充杜豫陈术譙周刘欣期等，或因误题，或出意测，皆无此书。

梁《益地志》六种

古志或以巴蜀合编,或以梁益同载。晋之梁州有汉中郡及东三郡(魏兴、上庸、新城)、梓潼郡及西二郡(武都、阳平)。益州有巴蜀之地,巴有三郡及涪陵,宕渠二郡,蜀有三郡及江阳、汶山、汉嘉、越嶲四郡。历考旧记,尚得合志数种。

黄容《梁州巴纪》

常氏《后贤志》常宽传:撰《梁益篇》,“时蜀郡太守巴西黄蓉,亦好述作,著《家训》《梁州巴纪》《氏族》《左传钞》凡数十篇。”古以巴梁同域,故黄著以之合编。张佳胤《刻华阳国志序》曾称其书,常氏《巴郡士女目录》曾引其文,是知虽与常宽同为地理之书,郡下每著其人物。又“氏族”望族也,见《后汉书·朱穆传》。《晋书·挚虞传》有《族姓昭穆记》,容书亦族乘之类。

常宽《梁益篇》

为地理之书,非人物志,已详前录。其书包有二州诸郡,又广于巴梁。黄常二志皆为常道将四地理志所采,遂无流传。

袁休明《巴蜀记》

《隋志》著录《巴蜀记》一卷,未注撰人,《通志·艺文》同。《蜀中著作记》六:“《巴蜀志》晋袁休明撰,其略云:高

山嵯峨,巖石磊落。倾侧萦迴,下临峭壁。行者攀缘,牵援带索。全书不传,此数语见酈道元《水经注》,亦碎金残璧也。”案若水朱提县下引此志,“壁”作壑,“带”作绳,未有“三蜀之人及南中诸郡以为至险。”所记夔道之山,为滇蜀往来所必经,故云。章宗源《隋志考证》亦据《若水注》引袁志以当之,姚振宗《隋志考证》谓:章氏据注,以为袁著,“或即此书。”

又《御觉经史图书纲目》列有《巴蜀志》《巴地记》《巴南山川志》三书,《巴蜀志》疑即《巴蜀记》,《巴地记》与《御觉》屡引《蜀地志》或系同编,似为唐人之书。《巴南山川志》亦为曹学佺《方物记》所引,又见《千顷堂书目》,或疑为譙周书,非是。

《巴汉志》

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注引《巴汉志》九条,文多录自常志,汉水二源,东出养山,西出幡冢,即采道将之说,撰人未详。《御觉》同引二条,或误题《巴汉记》,“志”“记”易讹,如《巴蜀志》又作《巴蜀记》即是。丁国钧《补晋书艺文志》二譙周《三巴记》条云:“《续汉书郡国志》注巴郡下屡引《巴汉志》,即此书。”以此书为《三巴记》,甚为鲁莽,故文廷式《补晋书艺文志》三巴记条云:

“章宗源考证云云。余按《续汉志》注引譙周《巴记》，其余引《巴汉志》八条，《巴记》四条，皆不着名。盖《巴汉志》非譙周书也。”沈家本《续汉书志注所引书目》亦分列譙周《巴记》、无撰人《巴汉志》各为一书，互不相涉。

刘澄之《梁州记》

章宗源《隋志考证》六著录此书，从唐宋类书辑文三条，皆汉中郡事。案《寰宇记》梁、利、洋、金四州皆有引文，利州绵谷县之玉女房、龙门山，巴州之美农台，并属蜀中故事。正犹《荆州记》之涉及巴东山川，《夷陵风俗记》之叙及夔州（《集注杜诗》四《夔州歌十绝句》、《草堂方笺》补遗一《溪涨》并引记云“白帝城据百牢，至夔州三里”）。澄之多见古志，《隋志》有其《地理书钞》十卷，旧录其《梁州记》《荆州记》《扬州记》《江州记》《豫州记》《广州记》《交州记》，似即《书钞》之分卷。姚振宗谓：“是书盖总名《永初郡国记》，”各为篇目。然《隋志》著录为齐都官尚书刘澄之撰《水初山川古今记》二十卷，与《书钞》并列，又非一书。按《宋书·宗室传》澄之为高祖族侄，《顺帝纪》昇明元年以骠骑长史刘澄之为南豫州刺

史。书题“永初”，正撰于宋武之时。

又《輿地纪胜》屡引《汉中记》，《方輿胜宽》题为“绍兴孙道夫《秦汉中记》，”不知此书亦涉及巴蜀地理否。

任弁《梁益记》

《郡斋读书志》二：“《梁益记》十卷，右皇朝任弁撰。天禧中游宦于成都，以《蜀记》数家，其言皆无所据依，乃引书传刊正其谬。”（《蜀中著作记》六同）《直斋书录》八：“《梁益记》十卷，著作佐郎益州知录事参军任弁撰，天禧四年自序。”或作任升，《玉海》十五地理：“天禧《梁益记》，书目天禧中任升（注晁氏云任弁）以《蜀书》有数字，皆穿凿诞妄，于是删次十卷。”《宋史·艺文志》亦作任升，《通志·艺文略》缺其撰人。晁陈二家据书著录俱为任弁，《玉海》《宋史》从书目题名为任升恐非。弁序以唐《蜀记》多误，如云梵安寺乃杜甫旧宅，崔宁妻任氏居之，后舍为寺，误以杜宅任宅及寺为一地。弁记刊正为，杜宅之宅后为任氏之居，后舍入寺。宋人注杜诗者，如九家集注、王氏集注、《草笺诗笺》等，多引其文，所涉亦广。

《文翁学堂图》

《隋书经籍志》杂传类有《蜀文翁

学堂像题记》二卷，《通志艺文略》同。

《唐书艺文志》著录为《益州文翁学堂图》一卷，亦见《通志》并注云“《隋志》作二卷。”《玉海》五十七艺文《汉礼殿图·文翁学堂图》条，亦并列隋唐二志目。因知《唐志》之学堂图一卷，即《隋志》之画像，并录题记，故为二卷。文翁学堂见《汉书循吏传》：文翁舒人，景帝末为蜀郡守，爱好教化，乃选郡县小吏张叔等十余人，遣诣京师受业博士。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，文翁以为右职。又修起学官于成都中，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，县邑吏民见而荣之，数年由是大化。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总叙亦记之云：“孝文帝末年，以卢江文翁为蜀守，学校夷陵，翁乃立学，选吏子弟就学。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，东诣博士受七经，还以教授。学徒鳞萃，蜀学比于齐鲁。”常志载文帝末翁为守，始兴教，又遣士诣京受经还，中历数年，故班传云景帝末由是大化。一记兴学之始，一记化成之时，年代遂异。古史载事，往往如此，论者是班而非常，非通言也。

常志又于蜀郡下叙云：“始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，作石室一曰玉堂，在城南。永初后堂遇火，太守陈留高朕更修立，又增造二石室。”精舍之正堂火后，高朕重建为礼殿。石室至宋犹存，李石《府学十咏·石室》序云：“汉孝景时，太守文翁始作石室。西为文翁，稍南为高朕，比文翁石室差大，皆有石像。朕或作朕，宋温之璋洗石以辨之，

乃朕字也，诗稟切。蜀守席益奏，秩文翁高朕于祀典。窃疑二室用户蜀人祠二公之意，必非自作。”石室似为藏书之所，《隶续》十四石室题名云，“秉烛入室”，可知其非讲堂矣。高朕增造为二，后人即分祠二公于二室，各有造像，非蜀人造像始有石室。石室之东为高朕所立周公礼殿，晋齐画像在焉。《玉海》文翁学堂图注：“《益州记》成都学有周公礼殿。旧记云汉献时立，高朕文翁石室在焉（注朕再作石室，在文翁石室之东，又东即周公礼殿）”。注分二室一殿，诸书皆同。《玉海》一六一宫室“汉文翁石室、周公礼殿”条注：“高朕于石室东夏造一石室，〔又〕为周公礼殿。”石室非礼殿，当增“又”字以别之。

礼殿之制，见任预《益州记》：“文翁学堂在城南，昔经灾火，蜀郡太守高朕修复缮立。其栌椽节，制犹古建，堂基高六尺，厦屋三间，通皆图画古人之像，及礼器瑞物。堂西有二石室”（《御览》礼仪部学校引）。唐人《益州学馆记》云：“献帝兴平元年，陈留高朕为益州太守，更葺成都玉堂石室，东别创一石室。自为周公礼殿，其壁上图画上古盘古李老等神，及历代帝王之像，梁上又画仲尼七十二弟子、三皇以来名臣。耆旧云，西晋太康中，益州刺史张收笔（注：古有《益州学堂图》，今日别重妆，无旧迹矣）。刘瑱，瑱齐永明十年成都刺史刘俊再修玉堂、礼殿

发灵宇严肃。俊弟瑱,性自天真,时推妙手,画仲尼四科十哲像,并车服礼器(注:今已重妆别画,无旧踪矣)。”文中小注为《益州名画录》载文时所增入,案此记为唐永徽元年修缮庙堂(即礼殿),并增涂饰时所作,《金石录·跋尾》著录为《唐益州学馆庙堂记》,撰人题“法曹成王文学太子詹事待诏宏文馆陵州长史”,名姓残缺,《东坡集》题为贺遂亮撰,成都令颜有意书,《集古录》误颜为撰人。礼殿晋画为三皇以来帝王名臣,及七十二子,齐画为车服礼器,及孔门十哲,唐又重妆别画。十哲即“德行”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,“政事”冉有、季路,“言语”宰我、子贡,“文学”子游、子夏。《輿地碑目》谓,姚崇宋璟等《十贤赞》今存其七。又有周孔之像,《寰宇记》云:“文翁学堂一名周公礼殿”。原祀周公,自唐册祀孔子,乃废公祀而存其像。宋祁《文翁祠堂记》云:“初翁为礼殿,以舍孔子及七十二子之像。殿右庑作石室,舍翁像于中。晚汉学焚,有守曰高朕,能兴完之,后人又作朕像,进偶公室。”谓文翁立文学精舍即有礼殿,并祀孔子,乃概略言之。李石《府学十咏·礼殿》序云:“汉人祀周公为先师,故钟会记(按即高朕修礼殿记)云周公礼殿。”汉时所祀为周公,唐时所祀为孔子,二像并存,故诗云“先圣先师同此室”。宋祁记称“祠堂”,乃其帅蜀时,于学宫西别建之文翁祠,祠中亦画十贤,又撰《学

府文翁画像十赞》,十贤为文翁、相如、王褒、庄遵、张宽、李仲元、何武、扬雄、高朕、蒋堂。宋蒋堂以蜀守兴学,故与文翁高朕并列,其余七人皆两汉蜀贤。

礼殿画像为晋张收、齐刘瑱等。据黄休复注唐人《学馆记》云:“古有《益州学堂图》,今已别重妆,无旧迹矣。”古图即隋唐志著录之《益州文翁学堂图》,唐时重妆,已非原迹,宋又重摹。李石十咏《礼殿晋人画》序云:“耆旧传云,西晋太康中益州刺史张收画右军书三皇五帝以来人物精妙。嘉祐中王素命摹写为七卷,都一百五十五人,为《成都礼殿圣贤图》。蜀守益席又尝摹其容貌名位可别识者一百六十八于石经堂。”又《齐人画礼器》序:“齐永明十年刺史刘悛(俊)画殿壁器服如《三礼图》,席益模本于石经堂。”王素知益州在宋祁后,为嘉祐四年,临写七卷,只百五十五人,是因唐重妆所存者摸之。席益为成都四路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在绍兴六年,重绘唐画于石经堂,多出十三人,当从《益州学堂图》出。此堂亦在府学中,李石十咏《石经堂》序云:“伪蜀广政七年,其相毋丘裔,按雍都旧本《九经》,命平泉令张德钊书而刻诸石,是岁实晋开运甲辰也。蜀守胡宗愈作堂以贮石经,席益增葺为记。”蜀刻石经未竟而亡,至宋方补成《十三经》,元祐五年宗愈知成都府,乃作石经堂于府学以陈之。席益重摹后,江西亦有刻石,楼钥《跋周公礼殿

图》云：“余近得临江《周公礼殿图》石刻，绍兴十七年向芑林刻于学宫，疑与先人所藏画本不侔。闻大资政赵公帅守成都，尝摹礼殿本为八轴，借而校之，丹青焕然，自盘古而下，位次向背不同者八九……丹青愈工，皆石刻所无。益州刺史张收，未知在汉何帝时，后汉诸名儒或在其前。若钟繇诸葛亮王濬杜预张华等，皆魏晋间人，既在张收之后，岂后人所续耶。”赵汝愚为四川制置使在淳熙中，当范成大等后。江西所刻疑出席益重摹本，故与楼氏家藏旧本及汝愚临本不同。然以张收为汉人，因疑图中魏晋诸人为后人所续，实不然也。

庆元间，四川制置袁说友修《成都志》，中有《成都周公礼殿圣贤图考》一卷，存于至正三年费著《成都志》中。《全蜀艺文志》又从费志收入《图考》，因题为费撰，撰人虽误，而文犹旧。今求《礼殿图》者，以此为最备，录之如下：

至圣文宣王庙在子城内南门之东，前汉文翁学宫故址。后汉献帝兴平元年甲戌，太守高眈（原注：音审，俗误为朕）重立，距今庆元戊午，凡一千四年。旧号周公礼殿，殿制甚古，低屋方柱，柱上狭下广，与今异制。左柱有《高眈修学舍记》，凡三百四十二字。其文纪汉初平五年，按史，初平止四年，次年尽管为兴平，今尚云尔者，岂是时天下方乱，道梗不通，或未知朝廷

改元耳。殿有版龕护先圣像，丘文播画山水，龕后有板壁，黄筌画湖滩。丘画今亡，独黄画存。殿之壁高下三方，悉图画上古以来君臣，及七十二弟子像，世传晋太康中太守张收之笔，收子载（一本无此三字）即铭剑阁者（者字作张载父）也。东晋王羲之有帖问蜀守云：知有汉时讲堂，是汉何帝。知画三皇五帝以来备有，画又精妙甚可观，彼方能画者，欲因摹取，以广异闻。则此画当在永嘉前，疑非出于张收，又按元丰郭若虚《图画见闻志》：汉文翁学堂在益州，昔经颓废，高眈复缮立，图画古今圣贤之像及瑞物于壁。抑东汉以前人物，高眈时所作，至收辈递增益之欤。嘉祐中王公素摹写为七卷，凡一百五十五人，为《成都礼殿圣贤图》。绍兴中席公益又摹写于石经堂，凡一百六十八人。案《续记》可辨识姓名者一百七十三人，今貌像宛然者一百四十九人，仅存仿佛者三十二人，姓名存者六十五人。今仍记《续记》姓名于左：（名略）

此文之《高眈修学舍记》即《隋志》之《题记》，详见后文。殿龕板壁有黄筌丘文播画，皆孟蜀时人，盖孟昶刻石经，并兴官兴，又尝修缮礼殿，命工作画。《夷坚志》又载：成都府学有菊花仙，传为汉宫女。石室壁画妇人，持菊花，前对一猴，号菊花猴子。此画恐亦孟蜀时作，然非汉宫人，当是石室侧壁侍女，如敦煌壁画所见，正持花供养。

图考据右军帖、若虚志以辨画像早在张收前,推之更古。郭志本出《益州名画录》,未言高昉时作。始记此画者为《益部耆旧传》:“益州刺史董荣图画濠周像于州学,命从事李通颂之。”颂文当成于晋武泰始六年周卒之后,而陈寿传亦撰于泰始五年为本郡中正后,皆早于太康,则张收前学宫固已有画像,至收乃蔚为大观。晋画像后,北周又增绘豆卢辨等,见《元和志》。张彦远《名画记》,分别为古画及晋画云:“《益州学堂图》昔画古圣帝贤臣七十子,后代又增汉晋帝王名臣,及蜀之贤相牧守,东晋时物。”唐时晋齐画笔“已别重妆,无旧迹矣”。言语“殿之壁高下三方”悉画人物,即唐时重妆。所记宋时所见唐画人物之数,前后参差,亦可推寻其故。庆元《府志》载:像貌宛然者百四十九人,仅存仿佛者三十二人,则唐画共有百八十一人。嘉祐时临摹画像姓名俱存者仅得百五十五人,故绍兴初重绘于石经堂者,据唐《学堂图》增成百六十八人;绍兴三十年王刚中之《续记》录名百七十三人,似据史补之。唐人注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即三引此图,据以考史。《传》云:“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”,索隐云:“《孔子家语》亦有七十七人,唯《文翁孔庙图》作七十二人”。后世习称孔门七十二子,盖有所本,《御览》二〇一华峤《后汉书·灵帝纪》:“元(当作光)和元年置鸿都门学,画孔子及七

十二弟子像”,正是此数。又《续博物志》七:“孔安国撰《孔子弟子》七十二人,陈长文《(陈留)耆旧(传)》亦七十二人。”《传》云:“右三十五人颇有年名,及受业闻见于书传。其四十有二人无年,及不见书传者,纪于左。”索隐云:“《文翁图》所记,又有林放、蘧伯玉、申枨、申堂,俱是后人以所见增益,今殆不可考。”此数人为《史记》所无,亦不见于《续记》,唯申傥一人似近,知《续记》所录,较之唐图亦有所缺。《传》云:“邽巽字子欽”,索隐云:“《文翁图》作国选,盖亦避汉讳改。”今《续记》亦作邽巽,从史而不从图。《续记》何以不据图补名,而只据史补五人,其故未详,又唐画本百八十一人,或以图中八人名不足录而去之耶。唐《文翁学堂图》及绍兴重绘,今皆无传本。朱熹《跪坐拜说》尝云:“其后乃闻成都府学有汉时礼殿,诸像皆席地而跪坐,文翁犹是当时琢石所为,尤足信据。”仅此略知画像形态。《益部谈资》:礼殿绘像“至唐已漫灭,宋嘉祐中重为摸写,增至一百七十三人。今学宫止有孔门诸弟子石刻,不知仍是故物否。”此误嘉祐据图写卷百五十五人为续记之像百七十三人,而明时所见,则有“诸弟子石刻”,又不知是画像或名录矣。

《隋志》著录《蜀文翁学堂像题记》二卷,图像与题记各为一卷,题记即《礼殿记》及《学师题名》《左右生题

名》，前记刻于殿柱，一名《殿柱记》。《隶释》一录存《益州太守高朕修周公礼殿记》全文，《全蜀艺文志》并采史子坚《隶格》之《周公礼殿记》，参校二文，采录如下：

汉初平五年仓（史本作苍）龙甲戌，旻天季月，修旧筑周公礼殿。始自文翁，应期凿度，开建頽宫，立堂布观，庙门相鉤口司慢延，公辟相承（史无上十二字）。至于甲午（案光武建武十年），故府梓潼文君，增造吏寺二百余间。四百年之间（史作际），变异遽起，旋机（史作璇丽）离常，玉衡失统。强桀（史作杰）并兼，人怀侥幸（史作际），战兵雷合，民散失命。烈火飞炎（案指永初火），一都之舍，官民寺室，同日一朝，合（史作变）为灰炭（史作烬），独留文翁石室庙门之两观。礼乐崩塌（史作坏），风俗混乱，诵读已绝，倚席离散。夫礼兴则民寿（史作淳），乐兴则国化，郡将陈留高君，节符兴（史作典）境，迄斯十有三载，会□覆乱，□虑匡救，济民涂炭。闵斯丘虚，□□□冠，学者表仪，□□□□大小推诚，兴复第馆（史作学舍）。八音克谐，鬼方来观，为后昌基，□神不□。

此记与常《志》叙文学精舍相互发明，志虽取材于记，补足高朕之名，及永初遇火之时。题记不知谁作，李石十詠《殿柱记》序云：“范蜀公云，其柱钟会隶书刻其上。按会与邓艾同人蜀，在咸熙二年甲申，距汉兴平元年

（即初平五年）甲戌凡七十一年矣。”钟会之说，出于唐人《益州学馆记》：“庙堂东南柱上，钟会八分书题云云，”后世因传为钟会或钟繇之记，《集古录》更传为蔡邕所书。《金石录》十八《汉周公礼殿记》云：“今成都府学有汉时所建旧屋，柱皆方正，上狭下阔。此记在柱上刻之，灵帝初平五年立，距今盖千年矣，而字画完好可读。记有云：甲午年故府梓潼文君增造吏舍二百余间，按《华阳国志》有文参字子奇，梓潼人。平帝用为益州太守，不从王莽公孙述，光武嘉之。疑此记所载，即其人也，盖光武建武十年，岁次甲午云。”案常氏《先贤志》梓潼士女及《三州士女目录》皆作文齐，齐仕蜀为犍为属国，迁益州太守，乃南中之郡，非益州成都，半造吏寺者恐非其人。此记名称不一，《舆地碑目》著录为三：《汉文翁石柱记》：《集古录》云，太守高朕初平五年立。”又《殿柱记》：“先儒谓钟会书，在礼殿。”又《东汉学殿岁月记》：“《彙年录》：“绍兴六年奏，府学建于初平，汉人记其岁月于东楹。”《石柱记》《殿柱记》《岁月记》其实皆礼殿记也。

又有《学师题名》，载《隶释》十四，跋云：“右学师宋恩等题名，今在成都周公礼殿殿门之西序，蜀人谓之学师题名。其称师者二十人，史二人，孝义掾业掾各一人，易掾二人，易师三人，尚书掾尚书师各三人，诗掾四人，春秋掾议掾文学孝掾文学掾各一人，文学

师四人。从掾位及集曹法曹,贼曹辞曹史又三十二人,其漫灭不可辨者十三人。汉永平中,尝为四姓小侯立学,置五经师。此则蜀郡诸生(师)也。当是郡守兴崇学校者,镌石纪德,诸生既刻姓名,而诸曹史亦缀其末。惜亡其碑,不可考尔。”干道时,此碑已亡,洪适乃据拓片录之。《隶续》十四尚有石室题名数段,此不具录。

《左右生题名》著录于《輿地碑目》亦分二条,《汉文翁学生题名》云:“《集古录跋》,可见者一百二十人,文学祭酒、典学从事各一人,司仪、主事各一人,左生七十三人,右生三十人。”又《左右生题名》云:“《金石录》谓为晋宋间碑。”案《金石录》二十《左右生题名》云:“按欧阳公《集古录》汉文翁学生,余独疑其非是。余以字画验之,疑其为晋以后人所立,然初无所据,未敢遂以为然。其后以地理书参考,乃决知其非文翁学生,题名有……。”李石十詠《左右生题名》序云:“或云江阳、宁蜀、遂宁、晋原,以《晋志》考之,江阳蜀置,宁蜀遂宁晋原皆宣武平蜀后置。范蜀公云,西汉时诸生姓名。文学祭酒,典学从事各一人,司仪、主事各一人,左生七十三人,右生三十人,可考者仅百许人,亦载于欧阳文忠公《集古录》中。”《隶释》十四学师题名附记学生题名:“乃蜀晋所置郡,欧阳公以为汉文翁学生题名,非也。”学生题名,汉有此制,《艺文类聚》礼部学校门王粲

《荆州文学记官志》序云:“有汉荆州牧曰刘君,乃命五业从宋衷所作文学,延朋徒焉。宣德音以赞之,隆嘉礼以劝之,五载之间,道化大行。耆德故老纂毋闾等,负书荷器,自远而至者三百余人。”严可均辑本备载文学祭酒、从事及学官弟子姓名爵里。蜀学生题名,已在张收画像之后,置于殿门西序。其余碑石可考者,《輿地碑目》有北周益州制史宇文宪《总管大学碑》、宋初补刻《唐明皇追谥孔子册文》、大历十年《石室赞》、会昌百年《修文宣王教碣》。殿廷中尚有古碑,卢照邻《文翁石室》诗云:苔深不辨铭。岑参《文翁讲堂》云:丰碑文字灭,冥寞不知年。唐已漫灭,宋人遂无道及之者。

五代孟氏,重兴官学,迄宋而蜀学大盛,《茅亭客话》十:大中祥符初,任中正镇蜀,请蜀人任玠主石室,“大集生徒,讲说六经,以绍文翁之化,由是蜀中儒士成林。”《建炎以来系年录》载:绍兴六年教授范仲受奏言,本府学殿建于东汉之初平,汉人以大隶记其修筑年月于东楹。御书大成殿榜赐成都府学,从仲受请也。后又仿左右生故事题名,李石《左右生图记》云:文翁集蜀士教之,分左右两序。石掌教府学,“听以风补人数,至八百余员,又相与分八斋。其乡曲姓名,以齿为小录,以请于学官,请如汉故事,书之为《辛已左右生图》。绍兴三十一年纪。”李石资中人,绍兴二十一年进士,二十九

年为太学博士，黜为成都学官，学者数千人。石掌府学时，王刚中为四川安抚制置使，曾重建学宫，曹学佺《蜀中宦游记》刚中传云：“府学礼殿，东汉兴

平中建，遭时多故，日就倾地，乃属九县缮完，悉如其旧。”时有诸生八百人，分为八斋，为一代盛事。

《蜀地图》

《周礼》地官司徒：“土训，掌道地图”；注云“图九州形势山川所画。”又夏官司马：“职方，掌天下之图，以掌天下之地。”周公营成周，遣使以地图及卜词来献，见《洛诰》。秦有地图，见《汉地志》引。梁昭明太子《谢地理贲启》称“汉氏舆图，晋氏方丈。”晋之图法，精于前代，方幅一丈，寸以为率。自裴秀《地形方丈图》创六法，定比率，“以二寸为千里。”唐贾耽“画《海内华图》一轴，广三丈，从三丈三尺，率以一寸折成百里”，载于本传。《唐书艺文志》《通典艺文略》并录《地域方丈图》《地域方尺图》各一卷，丈尺之图，各有比率。下至《玉海》十四所录《宋方丈图》，皆属此类。唐变平面图为立体之法，李该“聚米拟其端倪，画地陈乎梗概”，见吕温《地志图序》。宋赵珣作“聚米图经”，见《赵振传》。《玉海》十五云：“聚米画地，成于指掌”，即马授聚米山、画形势之遗法，其来久矣。

汉有司空地图，成于平蜀之后。《后汉光武纪》：建武十五年，初巴蜀既平，太司空宾融等议封建，上舆地图。

《玉海》十四称《汉司空舆地图》是也。晋犹遵之，《春秋释例》五云：“今所画图，本依汉司空图。”分区则有《蜀郡国图》，《续汉书》载：“辛臣为田戎作地图，图彭宠张步李宪公孙述所分郡国，云洛阳所得如掌耳。”此田戎未破时，欲加兵于蜀，妻兄辛臣所作，画公孙据地，为蜀郡国。刘备议伐蜀，张松等“画地图山川处所”见《先主传》注。蜀汉之世，《玉海》十四有《吴蜀地图》。裴秀《禹贡地域图序》云：“大晋龙兴，混一六合，以清宇宙。始于庸蜀，深入其岨，文皇帝乃命有司，撰访《吴蜀地图》。蜀土既定，六年所经，地域近道，山川险易，径路迂直，较验图记，罔或有差。”其精确如此，唐宋后蜀图载于史地书目，兹举其要。

唐有《剑南地图》二卷，见两唐经艺志及《通志艺文》四，图分二卷，分画两川。《玉海》十四“唐《雋州图》一卷，《旧经》贞元十三年五月丙戌朔，韦皋收复雋州，画图来上。”又有宋绘“《蜀中山川形势图》，建隆二年十一月，先是蜀遗孙遇、赵彦韬及杨燾等，以（孟

昶)蜡弹帛书间行遗北汉。遇等至都下,彦韬潜取书以献。乃并赦遇燭,使指陈山川形势,戍守处所,道里远近,尽以为图。甲戌命王全斌等进讨,乙亥上出画图授全斌等。”事载《续通鉴长编》。平蜀后绘呈《蜀地图》,见《輿地纪胜》一六五广安军沿革:“图经载,太祖平蜀,以其地图来上,帝指浓洄镇

问左右曰,浓何谓也,或告以蜀人谓浊为浓,帝曰自今当为清州矣,今因得以名之。”《方輿胜览》五十六黎州大渡河条:“建隆三年,王全斌平蜀,以图来上,议者欲因兵威复越雋,艺祖皇帝以玉斧画此河曰,外此吾不有也,于是为黎之极边。”近代荣县出土宣和二年《皇朝九域令守图》则甚简略。

《蜀记》

任弁《梁益记》序称:《蜀记》数家,其言皆无所据依,乃引书传,刊正其谬。是天禧以前已有数种,兹分为古《蜀记》及唐《蜀记》两类录之。

古《蜀记》《三国志·秦宓传》注引三皇出谷口,北周甄鸾《笑道论》引张道陵事,《文选·蜀都赋》注引杜宇事,皆出《蜀记》,撰人未详,不知同出一书否,今并视为古《蜀记》。有题为李尤或李膺记者,俱不可信。

《蜀中著作记》六:“《蜀记》后汉广汉李尤伯仁撰,《御觉》引之。”李尤传见常氏《先贤志》及《后汉书》,与刘珍共撰《汉记》,乃国史而非方志。案曹记据以著录之条文,本是《御觉》引任预《益州记》葭萌左担道事,《升庵外集》以记忆之误题为李膺。曹氏《蜀中诗话记》既引李膺记阴平左担道,又录杨慎所引葭萌左担道,以其书同文异,因改后条为李尤《蜀记》。本任记之

文,杨误为李,曹又改尤,撰人书名皆非。窜乱古籍之余,又自据其所妄改,加以著录,增造伪目。而于《蜀中风俗记》中,再改题为李充《蜀记》,一书而分属祖孙二人,混乱之极。又《太平广记》引李尤《蜀记》鳖令凿巫山事,亦唐人《蜀记》之文,误题李尤。

章宗源《隋经籍志考证》六据《寰宇记》引文著录李膺《蜀记》,案《寰宇》各州下分引李氏《益州记》及无名氏《蜀记》多条,各不相涉,独于梓州下引李膺《蜀记》八则,叙刘宋至后周间事,非其所著甚明。此当是唐人《蜀记》之文,盖所见《梓州志》已误为李书,乐史因之。或又据此误题,谓李之《蜀记》与其《益州记》“当系一书”,盖不知有唐人《蜀记》,误合为一。《輿地纪胜》怀安军下又有李膺《成都记》,则因《寰宇》之李膺《蜀记》改为《成都记》,撰人书名皆出窜改。

唐《蜀记》 郑晔《蜀记》三卷,见《崇文总目》及《宋史艺文志》。《直斋书录》八著录为二卷,谓“杂记蜀事人物古迹奇观之属,人代未详。”案《玉海》十六地理类:“《蜀记》三卷,唐郑晔,载建蜀之因及人物古迹。”《蜀中著作记》六亦录自陈目,并“案《蜀志补罅》以晔为成都人,复著有《天宾西幸略》云。”《御觉》州郡部及《寰宇记》蜀中各州多引《蜀记》,俱无撰人,唐有“蜀记数家”,未必即晔记之佚文,或是唐人另一《蜀记》。

《类说》三十六抄存《蜀本纪》五则,一记古蜀事,一记马头娘,三则为南诏事,自非汉人《蜀本纪》。首条叙蚕丛鱼凫杜宇,乃缀合伪雄纪而成,因误题书名。当是唐人《蜀记》,亦不能遂视为邓氏之书。

《郡斋读书志》二:“《蜀记》一卷,皇朝张守约撰,载孟昶初降至薨事。”此乃杂史之属,继《锦里耆旧传》《蜀檣机》而作,非地理书。《蜀中著作记》六:“元灯《蜀记》一卷,出《宋史新编》,未详人代。”案《宋史艺史志》录入传记

类,似亦宋人之作,未见佚文,内容不详。

附《游蜀记》 章氏《隋志考证》六补列“《蜀记》卷亡,段氏撰。”案《御觉》及《寰宇记》俱引《段氏游蜀记》,或省称《段氏蜀记》及《游蜀记》,同是一书,皆记方物。补入隋志,本无确证。《蜀中著作记》六云:“《段氏游蜀记》、《锦里新闻》三卷,俱唐段成式著,见《寰宇记》及《宋史经籍志》。”谓是成式之著,不知所据,或因其《酉阳杂俎》多载异物,推而及之。又《通志艺文》有宋李用和《游蜀记》一卷,与段记同名,各是一书。《蜀中方物记》一引《游梁记》载夔夷火兽,富顺大蛇,亦宁人书而记异物者。

附唐《蜀志》宋人烦书及地理屡引《蜀志》,多记蜀史及地理,始见于《御觉》及《寰宇记》,当是唐人之作。其记事或同于陈寿常璩之《蜀志》,而文已异,方志转录前史往往如此,故不复仍为原著。又有《蜀地志》,多记异物,二书俱未见著录,作者不详。

《华阳风俗录》

《唐书艺文志》著录“张周封《华阳风俗录》一卷,字子望,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从事,试协律郎。”《崇文总目》二、《玉海》十五并有著录。周封历仕补

阙、工部员外郎,见《酉阳杂俎》十七、十五。隋唐地理称风俗者,多属土风民俗,并及故事琐闻。

《御觉》文部引《大业拾遗记》:初

撰《区宇图志》五百余卷，更敕秘书学士十八人修之，成一千二百卷，“袁朗序蜀郡风俗。”案《隋书隐逸崔廓传》：大业五年，崔曠受诏与诸儒撰《区宇图志》二百五十卷，奏之，帝不善之，更令

虞世基许善心衍为六百卷。而隋唐经艺志著录只一百二十九卷，张彦远《名书记》同，三书所记卷帙名异，不明其故，袁朗《蜀郡风俗志》更无佚文。

《华阳记》

赵抃《成都古今集序》云：“如关羽墓，今荷圣寺闾然有榜焉。而仁显者，孟蜀末僧也，作《华阳记》云：墓在草场，庙在荷圣。此目击之所当弃，而从仁显者也。”《蜀中著作记》六：“《华阳记》伪蜀广政中荷泽院僧仁显撰，《古今集记》取之。”此据赵序而录之，误为荷泽寺。羽墓所在即明清城南之衣冠

庙。

《水经·江水注》引《华阳记》四则，本常氏《华阳国记》之文，与仁显书名同。仁显记及《风俗录》宋时尚存，皆以为已不可见，未料诸家注杜诗，每引二书以释西川故事名迹，各有佚文若干则。

唐宋《成都记》三种

自唐《成都记》至宋《成都记》相继而作，后世引其文者，不能区分，遂误以宋记为唐事，唐记为宋事，转相混淆。兹分录之，有以区别。

卢求《成功记》

《新唐艺文》二：“卢求《成都记》五卷，四川节度使白敏中从事。”《宋史艺文》三、《崇文总目》二、《通志艺文》四及《太平广记引用书目》并录是书。《成都文类》《全蜀艺文志》并载卢求自

序云：“大中六年四月，诏以丞相太原公有驱制羌戎之成绩，由邠宁节度司徒同平章事镇蜀。蜀为奥坏，领州十四，县七十一，户百万，兵士五万，分疆接两蕃。人性劲勇，易化以道，难诬以智。先是西蜀图经甚备，朝野之士多寄声写录，主兹务者不胜其烦，遂尽削而焚之。长吏至，即据显者集为一轴以献，由是百不书一。大中八年，户曹参军蔺弘宗甚好学，且目睹司徒相国之异绩，愿付以传示于后。然不以文

自任,剪裁疏长,芜言不略。相国乃属于小子,令刊益之,且曰不以掩徐疾速,归于流布,以为不朽之事。求受命震怖,又不欲以图经为目,乃搜访编简,目为《成都记》五卷,经与图附益之,愿终弘宗之职,庶以此为助也。大中九年八月五日叙。”《蜀中著作记》六亦录此序,宋初之书如《御觉》《寰宇记》及《益州名画录》所引《成都记》,俱属卢求之作。

杜光庭《续成都记》

《宋史艺志》《通志艺文》著录一卷,《蜀中著作记》六注出《宋志》。《玉海》十五地理:“《成都记》五卷,唐大中中卢求,总裁成都所管十六郡及羁縻州道里远近事迹。(蜀)乾德中,杜光庭《续成都记》一卷。”《方輿胜览》成都府下题为杜光庭《续记》,只存一则,然考其书,乃分篇载事,若《青城山记》《治水纪》《石笋记》《玉垒记》等皆应属

之。《山记》存《全唐文》中,《水记》多则或误题《山记》,《石笋》《玉垒》各存一则。

宋《成都记》

宋人注杜诗“九家注”“集注”“诗笺”三本,及施、王注《苏诗》二本、元注《李诗》俱引此记,不题撰人。所记为山川城邑、台楼祠庙、园池桥梁,泛涉先秦汉晋唐五代至宣和人物杂事,必非卢求甚明。宋代屡修蜀志,书目缺载,其为宋人之书无疑。唯赵抃《成都集记》偶有省称《成都记》者,则难区分,如《古今类事》引太平兴国春牛之兆条,题为《成都记》,实是《集记》之文。张澍《蜀典》记绵州和尚草事,本出僧传,亦改题《成都记》,非独书名讹误,且拦他州事入成都。《古今类事》又引《成都广记》数条,记唐五代人物杂事,颇近小说,盖志乘杂说之类,正辅《成都记》而行,故称“广记”。

《成都古今记》五种

赵抃《成都古今集记》

《郡斋书志》二著录三十卷,“右皇朝赵抃编。抃自庆历至熙宁,凡四人蜀,知蜀事为详,摭其故实,以类相从,分百余门。”《直斋书录》谓成于熙宁七年。《玉海》十五云:“熙宁《成都古今集记》三十卷,熙宁中赵抃再守成都,

延博议之士,参考众书,述其郡邑山川,都城邑郭,府寺宫室之详,分百余门。”《通志艺文》四、《宋史艺文》三、《遂初堂书目》地理、《蜀中著作记》六并有著录。

自序云:“仆由庆历至今(熙宁壬子)四人蜀,凡蜀中利害情伪,风俗好

恶,瞭然见之不疑。尝谓前世之士,编摭记述,不失于疏略,则失之漶漫,不失于鄙近,则失于舛杂。向治平末,因取《续耆旧传》而修正之。去年陈和叔翰林以书见贻,俾仆著古集今,另为一书,此固仆之夙心,而未有以自发也。由此参访旧老,周谘硕生,辑以事类,成三十卷。”其先修正之《续耆旧传》,传非常宽之著,应即前文著录之《成都耆旧传》等,后即收入《集记》人物。并又博采郑晔卢求诸书,以成此记。自序其体例,断限不始于蚕丛不经之事,参取扬雄《本纪》而已,从经则始乎《牧誓》之庸蜀。述事难详者,或列数说,疑以传疑也。神怪不可为教之事,书之以待穷理,乱臣寇盗,书之以为警戒。书蛮夷以尽制御之本来,终宋平蜀见不可以苟窃也。蜀史部分所记大事,略如上述。

范百禄序述其门类云:“自开国权舆,分野占象,州部名号,因革之别。其镇其浸,冈联派属之详。都邑城部,神祠佛庙,府寺宫室,学宫楼记,囿游池沼,建制之目。门闾巷里,道里亭馆,方面形势,至于神仙隐逸,技艺术数,先贤遗宅,碑版名氏,事物种种,瓌譔奇诡,纤啬毕书。由秦汉已来,凡为守令莘莘有风迹者若干人,有唐迄今,知府事多闾硕端毅之望又若干人,其始至若代去之年月,序次昭然著矣。阙生钜人,科选德进,数百年间,无一遗者,实足以为一方盛观。”观其门类

之众,搜罗之广,已如后世之通志。书至明季犹存,曹学佺《蜀中广记》引录最多,其分记《蜀古今郡县通释》似即因赵记“州部名号”而成。《说乳》一卷只收九则,襟人亦多引之,至清已不传。近世李鹗翀《得月楼书目》曾录此书,孤本仅存,不知落流何处。今人尝辑得九十条,大半孱入他书他文,未为完善。

王刚中《续成都古今记》

《直斋书录》八著录二十二卷,“知府事王刚中居正撰。余近得此记,手写一过,于时岁在己丑,蜀故亡恙也。后七年而有虏祸,秦汉故迹,焚荡无遗。今其可观者,唯此二记耳,而板本亦不可复得矣。”己丑为理宗绍定二年,后七年端平元年,蒙古破蜀,兵祸至酷,沦为荒土,故有东京梦华之慨。

刚中序云:“昔清猷公删取张彭勾延庆郑晔卢求张周封等书,为《成都古今集记》三十卷。凡废兴迁徙,及城郭官府,坊市库厩,儒宫佛室,仙馆神祠,陵墓渠堰,楼台池苑之名数。与风俗之好恶,人物之臧否,方伯监司之至去,蛮夷寇盗之起灭,木石之殊尤,虫鱼之变怪,靡不毕载。其采获贯穿,亦勤且详矣。自熙宁迄今八十七年,事当纪述者,盖难遽数,而旧记莫或踵继。见闻异辞,日月寢久,恐遂湮灭,可不惜哉。晋陵胡丞公尝命僚属论议,未究端绪,寻迁宣抚使,事复中辍。余来此将周岁,蒙国威灵,边堠幸帖

息,斯民亦安堵如故。因以间隙,搜访纂辑,作《续记》凡二十二卷。前记载古事,往往有差误,则辨正之,脱遗则补足之。清猷所云知之有未至,编之有未及者,余固不免也,其亦有待于后之君子乎。”序举《集记》所资之书,张彭《锦里耆旧传》起咸通七年平南诏至乾德平蜀,为王孟两蜀之史,勾延庆订改为《成都理乱记》,年月尤多差误。郑晔《蜀记》杂记蜀事人物古迹,并卢求《成都记》、张周封《华阳风俗录》皆见前录。《蜀中著作记》六:“《蜀古今传》,《陵州志》云:宋续耆来守是州,暇日作《蜀古今传》,赵清猷公《成都古今集记》实摭用之。”序中详录《集记》门类,《续记》实依其例,续成于绍兴三十年。其前胡丞公议修续志,为绍兴八九年,胡世将自兵部侍郎出为四川安抚制置大使知成都府时。陈振孙于宋末得《续记》抄之,知其传世甚少,旋即亡失,宁人引录尚可掇拾。

范成大胡元质《丙丁记》

《蜀中著作记》六著录:“《成都古今丙记》十卷,宋淳熙制置知府范成大撰。《成都古今丁记》二十五卷,淳熙中制置胡元质长文撰。”范成大《丙记》序云:“前记赵清猷公作于熙宁七年甲寅,凡三十卷,蜀之始封及分野,梁益州、剑南西川及成都府属郡县得名之所自,废置因革之不同,考之详矣。后八十七年,当绍兴三十年庚辰,王恭简公续为之记,有辨其差误,附益其未载

者,二记今皆具存。《续记》之成,距今才十有八年,虽事之当书者不至甚夥,然恐自是日月寝久,来者难考,乃蒐耳目所及者继书之,名曰《丙记》。其二记已载者,皆不重出云。”

胡元质《丁记》序云:“《成都古今记》起自熙宁甲寅、前帅赵阅道《集记》凡三十卷。后八十七年,当绍兴庚辰,王时亨复为《续记》二十二卷,废置因革,纤悉巨细,靡不载也。又十有八年,当淳熙丁酉,范至能复为《丙记》十卷,距时亨去未远,虽不至如《续记》之多,然二书之所不及者,则加详焉。予以是年秋代匪帅蜀,四路兵民之寄在焉。居三年缀为《丁记》二十五卷,粗成一书。惟沈黎番部绎骚,逾时方定,姑俟论定,别为一编。合成都四记而观之,往事顿前,得过半矣。”

成化《成都府志》彭韶序总叙四记云:“宋熙宁间,赵清猷再知成都,始删修古今事为《集记》。绍兴间,制置王恭简公再集熙宁以来事为《续记》。至淳熙间,夔石湖胡长文二公相继帅蜀,又集南渡以后事为丙丁二记。丙丁者,意以《集记》为甲,《续记》为乙,且次第以俟后人于无穷也。凡事目创于《集记》,后三记皆祖述之,四记者今皆行于世。”迄清先后亡佚,《集记》遗文稍富,《续记》不过十则,丙丁记所存尤为寥寥。然《续记》之学官画像百七十三人名录,《丙记》之《石经始末记》《成都古寺名笔记》,《丁记》之《牡丹谱》

等,各以名篇单行。

孙汝听《成都古今前后记》

《輿地碑目》成都府碑记:“《成都古今前后记》,眉山人孙汝聪修《成都古今前后记》六十卷,见眉州《江乡志》。”又《輿地纪胜》潼川府碑记:“《梓潼古今记》,淳熙间郪令孙汝聪作。”《碑目》同,案孙为淳熙间人,其书名又与成都四记同,似即就四记,摄取共要,汇而录之,故以名编。孙之籍里始见《江乡志》,按《宾退录》三:开禧丙寅,眉州重修图经,号《江乡志》。《碑目》有《眉州古志》,题孙汝聪编,应在

《江乡志》前。

汝聪当作汝听,《纪胜》补阙六:抄本《碑目》载《成都古今前后记》《眉州古志》,皆题孙汝听。《蜀中著作记》六:《眉州古志》《梓潼古今记》亦作汝听,是明人所见宋本《纪胜》如此。嘉庆《眉州属志》乡贤志云:孙汝听作《眉州志》,修《成都古今前后记》。又选举志,士女志皆云:汝听州人,绍兴进士。按《直斋书录》十七:《三苏年表》奉议郎孙汝所撰,蜀人。知今本《纪胜》作汝聪,乃形近而讹,《碑目》又从之而误。

宋、元、明《成都志》

袁说友《成都志》

《輿地碑目》四成都府碑目:“《成都志》,袁说友序。”又引《旧志》之唐人《十贤赞》一则,即出此书。《文渊阁书目》十九旧志类尚存“《成都志》十八册,”或是元志。《蜀中著作记》六:“宋《成都志》,庆元中制置使建安袁说友序,作者不知为谁。按费著云:全蜀郡志,唯《成都志》有《文类》。今《文类》五十卷,为袁所集,则志必出其手,而自序矣。”万历时曹氏已不见其书,卷数未明,以为袁作是也,其序明言,命幕僚编次,是其所修。

序云:“唐白敏中始为《成都志》五

卷,本朝赵清献为《成都古今记》三十卷,相望今数百年,陵谷之变已不同,而物与时偕,湮废增益,又未已也。后有续记者,而会萃后先,各立程度,互见重出,所闻异同,殆凡数书矣。觉者不复一见而尽,或有病焉。某来守踰年,暇日宾客有曰:今天下郡国悉有志,顾以蜀大都会,而独弗备,诚缺文哉。乃命幕僚,摭拾编次,胚胎乎白赵之纪,而枝叶于续记之书,剔繁考实,订其不合,而附益其所未备。牖分彙辑,稽仿古志,凡山川地域,生齿贡赋,古今人物,上下千百载间,其因革废兴,皆聚此书矣。(下略)庆元己未孟秋望日。”序中特书蜀中凋弊之状,“今

间无巨室，田野无饶民，商者多乏绝，耕者半转徙，公不能以裕私，下不足以供上，熬熬然稍膏以火，而不自知也。”盖蜀人困于输蠲估赋，元气大尽，又有甚于胡元质序时。

说友事迹见《宋诗纪事》五十二：“袁说友字起崖，建安人。隆兴元年进士，除秘书丞，历宾文阁学士，（庆元间四川安抚置制使兼知成都府）嘉泰中同知枢密院参知政事，（咸淳四年知临安府编《临安志》）。为四川安抚时，辑汉以下迄宋淳熙蜀中诗文釐为五十卷，目曰《成都文类》。”今《文类》犹存，而志已亡，唯志之数谱流传，《輿地纪胜》《方輿胜览》各收佚文四事。

附《成都文类》蜀中哀辑文献，实始于唐。《宋史艺文》著录前蜀嘉州司马刘赞编《蜀国文英》八卷（《国史经籍志》五作《蜀国碑文集》），章咨编《成都古今诗集》六十卷。《成都集记》偶录诗文，即附于事，至袁说友修《成都志》，又辑诗文合编为《文类》，相辅而行。明清省志之有艺文志，即从其例。

《成都文类》五十卷，庆元五年四川安抚袁说友命扈仲荣等八人编，说友序云：“爰属寮士，摭诸方策，哀诸碑识，流传之所脍炙，友生之所见闻。大篇雄章，英词绮语，折法度，极炫耀，其以益而文者，悉登载而彙辑焉。断自汉以下，迄于淳熙。其文篇凡一千有奇，类为十一目，为五十卷，益之文于兹备矣。”朱彝尊《书成都文类后》称其

“颇为详整，杨文宪公慎《全蜀艺文志》所由本也。自杨氏志行，而袁氏之《文类》，度之高阁矣。”袁编后十余年，巴东仿之为《固陵文类》二十卷，《輿地碑记目》著录“《固陵集》费士弢编”是也。《蜀中著作记》云：“《固陵集》二十卷，宋广都费士弢达可著。嘉定中为夔守。编集管内山川建置、碑文记颂为二十卷，多半夔门之作，在旁县者十之二三。”自杨氏艺文志行，袁编遂微，费书亦亡。《輿地纪胜》一八二云安军下尚存《固陵集》五则：形势门“东有瞿唐”条，景物门德辉堂、镜秀亭、橘官堂三条，古迹门胸忍城条。

嘉靖二十年重修《四川总志》，杨慎取二《文类》，增删续补，以成《全蜀艺文志》六十四卷，以精富见称。袁编迄于淳熙，下距结集之时，不过十年，多存当时蜀吏庸滥之作，为杨所删削，且立“存者不录”之例，以杜附庸，顿觉改观，实集巴蜀文献之大成。明清省州县志艺文部分，赖有杨志，辗转抄录。万历四十九年杜应芳继之为《补续全蜀艺文志》五十六卷，续收明人之作，书亦繁富，而精审不及。传振商又约取杨志之文，为《蜀藻幽胜录》，仅补剑门摩岩有一首，流行不广。

费著《成都志》

《蜀中著作记》六著录：“元《成都志》，至正中费著撰。”《千顷堂书目》八、钱大昕《元史艺文志》同。序云：“全蜀郡志无虑数十家，惟《成都志》有

《文类》，兵余版毁莫存。蜀宪官佐，搜访百至，得一二写本，乃参稽订正，仅就编帙。凡郡邑沿革，与夫人物风俗，亦概可考焉。遂鸠工锲梓，以广其传。若夫《文类》之详，则有待于后之好事者。至正三年二月费著序。”著以进士历官汉中廉访使、重庆府总管。审序文意，仅就宋志写本订正讹字，实因袁说友《成都志》而重刊之，旧称费撰，固未详考。其《岁华纪丽谱》《笈氏谱》《蜀锦谱》《楮警幣谱》《钱幣谱》《氏族谱》《蜀名画记》《成都周公礼殿圣贤图考》《器物谱》九种，皆仍宋志，无所增改。杨慎《全蜀艺文志》自费志钞绿九谱，因题为费著，袁志诸谱及《成都乙丙丁记》之专篇，亦赖杨志而流行。后世又从杨志抄出单行，《四库总目》地理类著录《岁华》、《重笈纸》、《蜀锦》三谱，仍题费著。《岁华谱》岁华谱单刻有《说乳》、《续百川学海》、《宾颜堂秘籍》《墨海金壶》诸本，《学海类编》本改题《成都游记》。《蜀锦谱》亦有《说郭》《墨海》本，皆以费著之名埋没宋人之书。

《永乐大典》二七四一“崔字”崔与之条等尝引《成都大一统志》，成都方郡，不得受一统之名，盖抄自《大元一统志》成都府部而省称之。《元统志》本出蜀人旧稿，附记于此。《元史世祖本纪》：至元二十三年二月丙寅，以编地理书，召蜀人虞应龙。《元秘书监志》四：“至元二十四年正月廿四日，准

湖广行省咨，该虞应龙状呈：为理会地理勾当，数年用工，将古今书史传记所载，天下地理建置，郡县沿革事迹，源泉山川人物，及圣贤、赋咏等，分类编述，自成一书。取《汉书》王吉所云，《春秋》所以大一统者，六合同风，名其书曰《统同志》。”事由湖广咨文，因应龙来自所属。其来京师，湖南道宣慰使司付站船二只，载《统志》稿以俱。既至，即以秘书少监主修统志，因以旧稿《统同志》为蓝本修纂。许有壬《大元一统志序》云：“命中奉大夫（秘书监）札马里鼎、泊奉直大夫秘书少监虞应龙等，搜辑为志，二十八年辛卯书成”，凡七百五十卷。《经世大典序录》亦载此事：“至元间，尝命秘书少监虞应龙等修《大一统志》，”大德时增修成千卷。吴騫《元大一统志残本跋》谓：天顺时修《大明一统志》。“不过刺取《元一统志》之什一。”今《明统志》中多存宋人图经，即录自《元统志》，而《清统志》又取之于《明统志》，应龙之功，固不可没。

统志之名始于元，明清因之，唐宋习称郡县志，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，宋时蜀人亦有此著。《宋史艺文》三著录范子长《皇朝郡县志》一百卷。子长字少才，华阳人，以进士官太学，知崇宁县。华阳范氏，世传史学，子长继其家业，成此巨著，应龙亦传家学者。又《大典》各卷屡引潼川、临邛诸志，缪荃荪又从二二二七、八两卷“模字”濠州条，

抄出所引江阳诸谱,皆宋元图经。旧尝印行,题为《永乐泸州志》,仅以大典本名,非永乐时之志也。又卷二八〇六“灰字”牛鞞条,八八四四“庚字”踏青游条,引元《成都志》二则,牛鞞条与《纪胜》文同,当是庆元《成都志》之遗文。

明《成都府志》

成化《成都府志》彭韶序云:“我朝宣德初,故少宗伯五羊陈公庭器来为宪使,乃修《成都府志》。于古事采四记所言而约之,于今事依官修图志而新之,其于淳熙(案谓丁记)以后,至正(谓费志)以前之事,则未暇补入。亦无序文凡例可稽,盖未成之书也。迩来又五十年矣,成化丙申春,襄城李公公勉及韶,阶处藩宪(韶为副使),相与慨叹,兹事若缓而急,不可终坠。乃延礼致仕纪善黎君士佑、贡士徐君山甫,重加纂集,凡二十五卷。其义例颇与《集记》不同,不敢以戊己为差,名曰《四川成都府志》。”观其所叙,宣德志稿仍从《集记》体例,宋元间事缺而未载,仅据官修图经补明以来事,则洪武永乐间应有省志,未见著录。成化志乃变其例,故不称《成都戊记》,改题“府志”。其尽无存,《全蜀艺文志》录入彭韶《四川形胜述》一篇。

今存天启《成都府志》五十八卷,知府冯任领郡之三年,继万历《四川总志》而新修。开馆于什邡,知县谢奇举实主其事,集华阳、什邡、潼川贡廩生

五人共纂之,而潼川廩生张世雍又为之主。世雍尝参修《总志》,分任梓州,为众所许,因囑以成都之志。天启元年刻年,二十四册,抱经楼旧藏本,已流落海外。今传抄印行者,俱从原华西大学所得胶卷转录。

其书卷一至六为史地,凡例云:“省志载成都沿革甚略,今详之,已见《成都纪》中。若分野、山川、建置、形胜、城郭、赋役诸款,仍省志次第为类编,而疏者密之,漏者补之。”首列《成都记》为史纲,乃张世雍“取《总志》中编年纪事,有关于治道之大者,辑而录之。”次分野、山川至食货、水利二十类,多因《总志》,大体甚略,盖自嘉靖《总志》以来,即略于地理。卷七至二十九总属人物,分官守、科第、人物、侨寓、仙释诸类。其科第之详,如宋各朝、明各科,俱出《集记》及《总志》。卷三十至五十八为艺文,最为详备,凡例云:“艺文志自升庵先生以后,(万历)己卯己未二次遴选,谅极旁搜。今特拈出有名号于成都者,仍分前后二集,盖己未新选者,自芳鲜耳目于一时,不敢乱升庵之遗意耳。”前集卷三十至四十八题为《正集》,皆抄自升庵《全蜀艺文志》,即有阙文,亦仍其旧。后集四十九以下仅九卷,题为《续集》,抄自万历己未杜应芳《补续全蜀艺文志》。

附明总志 《四库总目提要》地理类雍正《四川通志》条云:“《四川通志》在明代凡四修。”始为成化志,正德戊

寅曾加修订,《千顷堂书目》七所录熊相《四川志》三十七卷,中山大学所藏正德十三年重刊本是也。继有嘉靖《总志》,王廷瞻万历总志序云:“成化中侍御瑞阳熊公始创蜀志,嘉靖初抚台东阜刘公、侍御金川王公,聘升庵玉垒方洲三太史续修之。”时在嘉靖二十年,杨慎罪谪在滇,王元正谪居茂州,杨名废还遂宁。巡抚刘大谟委以志局,杨名主山川赋役,元正主人物,慎主艺文。志凡八十卷,计帝王藩封监守一卷,名宦一卷,郡县十三卷,经略杂志一卷,共十六卷。以下皆为艺文,搜罗文献,既精且备,享誉不衰,屡有单刻。《总志》存北京图书馆,《艺文志》有嘉靖万历清刻诸本。明人著录见《天一阁书目》二之二:“重修《四川总志》六十四卷,刊本,明嘉靖二十年王元正重编,刘大谟谢瑜周复俊(案瑜为巡按上虞人、复俊按察吴人)均有序。”六十四卷为《艺文志》之数,注误,《千顷堂书目》七著录“王元正《四川总志》八十卷”方为足数。因其地理过略,杨慎别撰《蜀志补罅》四卷,后为明清通志所采,补志遂亡。万历志有《四库存目》之《四川总志》三十四卷,魏朴如游朴童良同撰。此志修于万历七年己卯,九年提学副使郭秉等续修刻行,题虞怀忠纂,《千顷堂书目》称郭秉《四川总志》三十六卷即是,北京图书馆亦有藏本。又有万历四十七年己未提学副使杜应芳增补《四川总志》四十四

卷,吴云皞纂。应芳增修,功在艺文,为《补续全蜀艺文志》五十六卷,取明人之作以续升庵旧志,而补者实多升庵所选汰。

万历间,按察曹学佺编撰《蜀中广记》一百八卷,适与《总志》相辅而行,更有所专。宋龙州助教郭友直尝撰《剑南广记》十四卷,其书已亡,乃博采古籍方志而成此著,为蜀中文献之书。《四库提要》谓:“谈蜀中掌故者,终以《全蜀艺文志》及是书为取材之渊藪。”唯书成众手,引文时有窜改误题。今存《四库全书》本,及各分记单刻本。计《蜀中名胜记》三十卷,专载地理名胜,分县编次,又取《全蜀艺文志》之诗,分条收入。有万历刻本,清《粤雅堂丛书》及四川官书局本,流行最广。《蜀中边防记》十卷,亦《广记》中著力之作,多存明时边县方志佚文,实为难得。《蜀郡县古今通释》四卷,书较简略,重在释州县之名,而不在其沿革,似出血《成都集记》。《蜀中宦游记》四卷,以上三记,前德化李氏曾藏万历刊本,不知尚存否。《蜀中方物记》十二卷,日本图书寮藏明单刻本。《蜀中人物记》六卷,为《明史艺文志》所收。《蜀中风俗记》四卷,《蜀中神仙记》《蜀中高僧记》《蜀中著作记》各十卷,采录亦富。又《蜀中诗话记》四卷,大多录自升庵《诗话》《词品》及杂著。《蜀中画苑记》四卷,汇抄旧著,亦便观览。

《巴郡图经》

周秦古志，图文兼具，图经之称，始《山海经图》。汉称“舆地图”“地形图”成“地理图簿”。六朝地志，多名图经，载于隋唐经艺志。如大业《区宇图志》千二百卷，“叙山川则卷首有山水图，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。”下至唐宋，方志尤兴，真宗祥符三年，李宗谔纂《祥符诸道图经》千五百六十六卷，乃就诸路州府所上图经编成。宗谔序云：“图则作绘之名，经则载言之别。”书成后，“又诏重修定大小图经，令职方牒诸州谨其藏，每闰依年录进，”此即三年一修之制。祥符四年牒：“别写录，颁下诸道圆经，新本共三百四十二本”（以上并见《玉海》十四）。故宋地理书引州郡图经，有古图经、旧图经、新图经之别，一志数修，前后转录，往往异文，书目著录，亦标题互异，篇卷不同。

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总叙：永兴三年，太守但望上《分郡疏》云：“谨按《巴郡图经》：境界南北四千，东西五千，周万余里。属县十四，盐铁五官，各有丞史。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，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。”即此所见，凡四境里，方幅大小，属县乡邑，盐铁官司，户口实数，莫不备详。此为蜀中郡志仅存最早之书，姚振宗《后汉

艺文志》二据以著录云：“按桓帝时巴郡守但望上疏，引《巴郡图经》，则图经之名，起于汉代，诸郡必有图经，特无由考见耳。”

《太平广记》三九九引《渝州图经》香草楼仙池，渝州城滩二则，以《广记》时代计之，当是唐时方志。《文渊阁书目》十九著录《重庆郡志》七册，以郡名重庆推之，应是宋时方志。《永乐大典》七二四二“阳字”尊安堂，八八四三“尤字”游仲鸿，一四三八〇“寄字”诗十三，共引《重庆郡志》三条，即是此书。《舆地纪胜》一七五重庆府引李宗谔《渝州图经》九条，则非专志，及其剑、普、开州诸图经，皆从《祥符州县图经》析出单行。即祥符四年“颁下诸道图经新本”，但就该州部分，别写颁发。《大典》九七七六六“覃子”北岩条，存《重庆府志》引李文昌《图经》一则同。《纪胜》又别引三种：卷一七五重庆府下引《旧图经》九条，一八〇南平军下引《渝州志》一条，《重庆图经》二条。称“渝州”志者，当是北宋之书，称“重庆府”者，应是南宋之书。宋元人注唐诗所引或称《渝州记》，九家注《杜诗》二十七《禹庙》引“《渝州记》：阆白二水东西流，三曲如巴字，是为三巴。”袭用谯周《三巴记》文，实是宋时方志。集

注《杜诗》五同诗及萧注《李诗》四《长干行》并引此则。《蜀中方物记》六引《巴志》：“三峡两厓，土石不分之处，皆种燕麦。春夏之交，黄遍山谷，土民赖以充食。”此或是明时之书。

唐有《夔州图经》，见刘禹锡《夔州刺史厅壁记》：“故相国安阳公乾曜，尝参军事，修图经，言风俗甚备。”《輿地

碑目》有源乾曜《夔州图经》，或是据书著录。《蛮书》卷十引《夔州图经》一则：“夷事道，蛮事鬼。初丧，鞞鼓以为道哀，其歌必号，其众必咷。”正记其风俗，按时代计，当即乾曜所修志。《能改斋漫录》九赤甲条：“按《夔州图经》云：鱼复县西北赤甲城，东连白帝，西临大江。”似为李宗谔总志之分册。

《蜀郡图经》

章宗源《隋志考证》据《文选·南都赋》注引《蜀郡图经》著录是书，然其文云：“太湖山在故县之南十里”，非蜀郡地，当是《吴郡图经》之误。宋后所见，《事文类聚》引《蜀郡图经》载高辛氏时马头娘事，或是李宗谔之分志。杜田补注《杜诗·石笋行》引《蜀图经》，记石笋及石笋街大秦寺，同属一书。《通志·艺文略》四有《川峡路图经》三十卷，案宋乾德三年置西川路，开宝六年分置峡西路，寻并为川峡路，此图经是也。咸平四年分置益、梓、利、夔四路，总曰四川路。四路并有图经，见《宋绍兴秘书省续到四库阙书目》二，凡《益州路图经》八十二卷，《利州路图经》六十三卷，《梓州路图经》六十九卷，《夔州路图经》五十二卷，《通志艺文》同，俱图文并载。五种地经，偶见佚文。

其余州郡，唐图经存于乐史《太平寰宇记》中。《宋史·乐黄臣传》：史为

太平兴国进士，官著作郎，转太常博士。《玉海》十五云：“太平兴国中，天下一统。史取自古山经地志，考正讹谬，纂成此书上之。”书中所引蜀志，有卷七十四《嘉州图经》、七十七《雅州图经》、八十二《梓州图经》各一则，八十四《剑州旧图经》《图经》各二则。七十五新繁县引《川中图经》系龙桥一则，七十四嘉州犍为县《益州地理志》、又《丹稜地图》各一则，亦唐图经。《太平广记》引《陵州图经》张陵盐井，大凡宋初二十年所见，尚是唐志。见于杂记者，如《能改斋漫录》引《涪州图经》妃子园荔枝，《西溪丛语》引《绵州图经》戴天山，恐是宋人之书。

王象之《輿地纪胜》引蜀中诸州图经，约一百三十种之多，为《方輿胜览》所不及，大多宋时所修。自序云：“仲兄行甫西至锦城，而叔足中甫北趋武兴，南渡渝谿，归来道梁益事，皆袞袞

可听。然求西川图纪于篋中，藏未能一二，虽口以传授，而犹恐时无所据依也。余因暇日，搜括天下地理之书，及诸郡图经，参订会萃，每郡自为一编。”成于嘉定辛巳，眉山李埴季允序于宝历丁亥。书凡二百卷，今存一四五简州至一九三剑门军，皆蜀之府军州监。所引图经，一州每至数种，而夔、涪、梓、嘉、泸州皆几至十种，可谓富矣。潘祖荫《舆地碑记目序》考其生平：“按《浙江通志》象之字仪父，金华人。庆元元年，中邹应龙榜进士。再检《纪胜》，又宝历乙酉从长宁太守孙若修《长宁县志》（按长宁军下云象之备员文学），绍定丁亥过重庆，与宪使黎伯巽辨涂山之谬，至乐碛观威烈侯碑，则所云靡国不到者，其事迹实得之亲涉。”陈振孙《直斋书录》谓：象之撰《纪胜》，逐州为图，逐路为卷，有《与地图》十六卷，四蜀诸郡尤详，其兄漕夔门时

所得也。惜清代翻刻，书残图缺。

《蜀中著作记》地理类汇录州郡县志六十余种，大多采自《纪胜》及《宋史》志目。一邑之志，兹不备举，其为唐志及有可议者，略述如下。”《阴平县记》今青川所，唐大中六年周茵撰”。又“《戎州记》今叙州府，《唐书》李仁实撰，顿丘人，官至左史。”又《夔州图经》故相国安阳公源乾曜参军时修。”夔州志已详上文，戎州记见《新唐艺文》，俱是唐志无疑。阴平记见《舆地纪胜》隆庆府碑记：“《阴平县记》唐大中六年郭茵撰”。曹记即录自此，恐是碑记而非县志，嘉庆《四川通志》一八八误从曹记以为阴平之志。曹记又收“《宋史经籍志》韩昱撰。”二书皆江南西路江州之误，重庆古江州县，修志不当借用古县名为府州志目，此乃通例，大意失之。

山川祠庙志

晋室南迁，江左荆湘好志山川名胜，虽寄情山水，亦流连哀思。于蜀亦然，常志所谓地理志颇言山水是也。考之故籍，举其要著，分类录目，略述如下。

江记类

《隋志》在庚仲雍《江记》五卷，又《江图》二种，俱亡。既为图志，应及上

游，源出巴蜀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索隐引《江记》：“奇相，帝女也，卒为江神。”即庚记佚文。汉祠江水于江原县，奇相即岷江之神。《寰宇记》眉州彭山县引《江图》：“江水经鼎鼻山”。又有《寻江源记》一卷，无撰人，《唐志》作五卷，《御览书目》省称《江源记》。佚文见《寰宇记》《舆地纪胜》。记岷江源及西

汉水高梁山至于峡口，正以蜀江为源。

《蜀中著作记》六著录：“《蜀江记》十卷，《剑南风物录》二十八种，宋东阳沈立撰，庆历间知洪雅县事。”案《宋史艺文志》沈立历阳人，著《蜀江记》十卷，《都水记》二百卷，《名山记》百卷，曹记“东阳”字讹。《嘉泰会稽志》二载：沈立字立之，和州人，熙宁三年守会稽。其《会稽图》自序云：“间领漕居杭，尝为《钱塘图》，今遂请守越，因作《会稽图》。”是其所至即有撰述。又《舆地纪胜》二十七瑞州引雷公编《蜀江记》十五则，江在州治北，今高安县犹称锦水。书与沈立同名，而立尝入蜀，所记固是蜀水也。

《著作记》有：“《离隼志》十卷，见《宋史新编》，不知作者。”宋人所称离堆，在灌口湔堰下，当属水利之书，今已亡佚。另有任慥《隄堰志》，于《蜀中名胜记》六灌县存其佚文五百六十字云：“粤自神禹导江正源，至石纽出汶川而南，其北无水（案谓堰北本无内渠）。秦昭襄王时，蜀守李冰凿离堆虎头，于江中设象鼻七十余丈，首阔一丈，中阔一十五丈，后一十三丈；指水一十二座，大小钓鱼护岸一百八十余丈，横渚洪流，故曰都江。以分岷江之水，北折而东，灌溉蜀郡田畴以万亿计，蜀用富饶，号称陵海。于所逼处，又设护岸，盖笼石附岸，水不蠢土，而渠可坚久。指水数十处，似象鼻状以扞之，皆冰之所作也。都江口旧有石马埋滩下，凡穿淘必以离堆石记为准，号曰水则，其下淘深二丈二尺，而

水则下亦深七八尺。石渠水口，横一丈五尺，从一百二十丈，深六尺。”以上叙宋时湔堰之制，分渠之法，穿淘之准，离堆水口宽长，皆属宽录。以下叙内江三渠各水口宽长深度最详，宋元二史《河渠志》叙堰北三渠，皆采自任氏此文。

山志类

《郡斋书志》二：“《青城山记》一卷，伪蜀杜光庭宾圣撰集，蜀山若水在青城者，悉本道家方士之言。”《直斋书录》八亦收此书，题蜀道士杜光庭撰。《通志艺文》著录《青城山记》一卷，《丈人观诗》一卷，勾台符《青城山方物志》五卷。三书唯光庭记存，见《全唐文》。《蜀中著作记》六有范仲立《青城山乙记》一卷，亡。《舆地纪胜》永康军引皇甫士安《青城山记》一则，习称《丙记》。

《著作记》：“《峨眉山记》一卷，《宋史新编》此记在卢鸿下。”《郡斋书志》八有张开《峨眉志》三卷，乃县志。山志尚存佚文一节于《舆地纪胜》嘉定府下，略谓：自（峨眉县胜峰门出，至华严院恰十五里。前代于峨眉山创寺六，光相居绝顶，为游山之底峰。华严居山之前峰，为游山之乡导，而白水寺居其中。自白水至光相，历八十四盘，山径如线，如是者六十里至峰顶，即普贤示现处，屋皆以板为之。

《纪胜》《胜览》隆庆府后尚存《剑门关志》节本一卷，虽与府县条目互见，而来而各异，盖一出州郡图经，一出关志，故右后者为关志之节钞，且有

撰人。《图书集成·山川典》剑山部艺文有王恽《大剑山记》一首，此记杂钞宋地志，以述剑门及剑山之沿革。考其体例，不类单篇为文，正是《剑门关志》之大剑山条，故文与《纪胜》《胜览》同，乃知关志为王恽之著。取关志之条目而改题为记，似始自明正德《剑州志》，录王恽志之“大剑山”条入县志，因题为记。正德后迄清雍正，剑州无续志，清修《图书集成》即据正德志录恽记入剑山部，来历甚明。关志幸存，可稽旧制，如“关沿革”条云：“蜀平，遂以剑门县隶剑门关，兵马都监主之，又以剑门关直隶京师（注《图经》云：剑门关承平时，以东京兵出戍，关有路分有驻泊，皆得进表，剑门知县亦同管关事）。中兴以来，剑门关亦列在利路十七郡之数焉（注《剑门集》云：皇朝景德中，以县不隶于州，俾司关者兼治之。熙宁中，关县析而为二，皆隶于州。元符中，又敕县令通管关事）。”此载宋时关制，“关官许令直受颁降诏赦，亦许直行申发文字”，且尝辖县，与州同级，并列于兴元府所统十六州，防险之重，超越前代。

行纪类

《通志·艺文略》地理行役类著录唐韦庄《峡程记》一卷。前书又见《宋史艺文志》，今存《说郛》本数则，皆记瞿塘滄预之险。后书又见《遂初堂书目》一卷，《蜀程记》佚文或题《入蜀记》，乃由秦入蜀。盖韦庄尝两次入蜀，昭宗光化三年两川宣论和协使李

洵举为判官，即从此道至，王建辟为书记，遂终于蜀。

《御觉》五十三地部引《峡程记》曰：“泸、合、遂、蜀四郡，皆峡之郡。自蛮江（按指涪江）桔柏（嘉陵江）沱（《寰宇》作池，俱非，当是沱江）道（岷江）等江至此，二百八十江，会于峡前，次荆门。都四百五十（《寰宇》作十五）滩，即有清水重峰，胡滩汉滩，忽雷闪电，叱滩瀨滩狼尾，使君主簿，皆使君主簿沉舟之所，遂〔以〕为名，其他不悉记之（《寰宇纪》八十八泸州江安县引至此补以字）。三峡者，即明月峡仙山峡（《九家注杜诗》一、《集注杜诗》九、《草堂诗笺》六《醉歌行》注，任渊注《山谷诗集》十二附黄知命诗注，“仙”皆作“巫”）广泽（应作溪）峡，其有瞿唐滄预、燕子屏风之类，皆不预三峡之数。”又《草堂诗笺》二十六《黄草峡》注引《峡中记》：“三峡之侧，多生黄草，虎豹资之。”同出一书。又《方輿胜觉》六十九凤州：“韦庄《入蜀记》云：大散岭之北，唐僖宗巡幸历山下，爱玩不爱去。”以上三条，皆《说郛》所未收。

案三峡之称，古今异说，《江水注》称夔峡为广溪峡，“乃三峡首也”，次巫峡，“巴东三峡”之长者，次归州东空冷峡，未入三峡之数，又西陵峡，“三峡其一也”。韦庄以夔巫明月为三峡，正与之同，明月峡宋称扇子峡，今灯影峡，此即用以泛称西陵峡。《方輿胜觉》夔州山川：“三峡谓西峡、巫峡、归峡”。又云：“瞿唐峡旧名西陵峡”，衍“陵”字，夔峡最西，故一名西峡。此则取归

峡以代西陵。庚仲雍称“楚三峡”为巫、姊归、归乡，姊归即归乡，尚缺西陵。《寰宇记》为巫峡，归峡、西陵方合，明清如《益部谈资》《蜀水考》皆从之，以瞿唐夔峡只十五里，故不入大峡之数。今若并举诸峡而称之，首为夔峡，次巫峡八十里，分金盔银甲与铁棺为两峡，西陵最长，自姊归香溪至宜昌南津关皆是。西陵亦分两段，上段包姊归之兵书宝剑峡（宋称白狗峡）牛肝马肺峡（即马肝峡）及空冷峡，至黄陵庙西。下段自黄陵以东，即西陵峡，楚人又以此段之黄牛、明月、黄猫为三峡。

唐人《段氏游蜀记》外，《云仙杂记》引《浣花旅地》数则，即《蜀典》十六所引《浣花旅地志》。《通志艺文》有宋李用和《游蜀记》一卷亡，《四库存目》王质《西征丛记》一卷，记自兴国至成都往返行程。《说郛》存王周《峡舟记》一卷，而以陵游《入蜀记》、范成大《吴船录》为现行名著。北道行记，《宋史艺文》有陈延禧《蜀北路秦程记》一卷亡，余不多见。清则王士禛之《蜀道驿程记》、张邦伸《云栈纪程》为要著。

祠庙类 蜀中祠庙，旧有专志，《蜀中著作记》五有齐益州刺史刘俊撰《益部寺记》，及宋李之纯《成都大慈寺集》《成都大慈寺记》各二卷。刘记见《高僧传·序录》，后二书见《千顷堂书目》。《郡斋书志》二著录《蜀三神祠录》五卷，皇朝井度编。任四川漕日，录梓潼、灌口、射洪三神祠碑文板记成此书云。四志俱亡，而大慈寺之大略

可考。按《益州名画记》卢楞伽条“至德二载起大圣慈寺”，《成都文类》四十郭印超悟院记亦详其历史。李之纯记谓有“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四十二间。”《蜀中高僧记》二无教条“武宗废教，成都止留大慈一寺。”故黄休复画记中多存名迹，其散见诸院之名，计有文殊阁、药师院，前寺石经院，中寺大悲院，大将堂、乾宁初蜀先主于大殿东庑起三学延祥之院（旧名东厨院），竹溪院，崇福禅院，崇真禅院、罗汉堂、观音堂、建中元年大圣慈寺南畔创立僧伽和尚堂、多宝塔、维摩诘堂、极乐院、华严阁、兴善院、中和院、灌顶堂（以上见卷上）。炽盛光明院、观音院、中寺六祖院、六祖院罗汉阁、三学院罗汉阁（以上卷中）。玄宗御容院、萧教院、方丈院、多利心院、经楼院、放生池、揭帝堂（以上卷下）。范成大《成都古今寺名笔记》亦详成都诸寺院阁名，大慈存三十余院名。

何时礼《浣花草堂志》撰于乾隆中，录以为殿。闽人郑天锦序谓：“今年春（案十三年戊辰），友人何君希颜主余家，借余行篋书，手披目览，凡涉浣花事者，摘录成编。会君应广都书院聘，载书以行，迟数月复来，则已部署秩然矣。”此指其初稿，郑何世交，“尝共事府乘”，故别撰此志。据自序成书在十六年，其师宜兴储掌文、丹稜彭肇洙为题序，至二十八九年犹有闵鄂元彭端淑序，同时师友顾汝修、李调元、张邦伸皆为览阅，为时人所重，而无力刊刻。迄道光六年，方刻入《壁经

堂丛书》，民国十二年重刊。新津胡淦据其孙峤道光丙戌跋为题识云：“清何明礼撰，明礼字希颜，崇庆县人。乾隆二十四年乙卯科解元，《县志》有传。是科大主考刑部员外郎浙江闵鹗元，中式五名之罗江李调元，二十二名汉州之张邦伸，皆有著作行世。是书成于乾隆十六年，刊于道光六年，屈指凡七十八年，由分州华严寺僧遇普名宣，与谭有第合贖付梓。”明礼工诗，见调元集及其《蜀雅》、《国朝全蜀诗钞》。一志之成，历数十年，方由西山寺僧助梓。书刻粗劣，讹误盈编，可谓穷矣。

《蜀故》十六载四一居士《浣花溪志叙》，即为明礼此书作，称其“穷流溯源，一本诸家，而自出机杼，酌古准今，刊讹存实，俾其事信而可证。”书凡八卷，分十六目。卷一“源流”略述浣花溪水，“旧迹”考草堂寺及少陵草堂，俱疏于地理，“胜概”列当时草堂亭桥之名，“碑碣”载宋至清十一碑目。卷二“人物”，考少陵草堂诗所见交游，及历代建祠之人。卷三至五“艺文”，记类为宋迄清建修草堂之文十二首，序类录王洙以下《杜集》序文，皆抄自注本，杂著类有关杜公之文。卷四辑录少陵作于草堂之诗，卷五录唐宋以来诸家题咏。卷六“物产”释杜诗之草木虫鱼及薛涛笺考。卷七“诗话”约五十则，择取亦不甚精。卷八“轶事”属浣花琐闻，“诗余”十六阙自题其类目，如史传之后赞。

考其成书，资于行篋，所见旧籍无多，然例属草创，事类渐备，亦为难得。

尤可贵者，为当时所见碑刻，并录蜀志所载碑记，可考明清历朝草堂之修建，而略于宋。“碑碣”类十一目为：宋吕大防刻《杜公遗像碑》、胡宗愈《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》、吴中复《任氏夫人碑》，以上三碑，仅据旧志钞文录目，碑已不存。明刻有朱曰藩《人日草堂诗碑》，房子侨《题草堂诗碑》，张三丰书唐诗碑，《重摹少陵先生遗像碑》。清则雍正十三年果亲王题“少陵草堂”四字碑，又书王维诗碑、康熙壬子《重摹少陵遗像碑》、董肇勋《拜少陵遗像四诗碑》，当时所见少陵遗像已有二碑刻。案乾隆前旧刻，先有万历壬寅何宇度摹刻本，题识云：余先司寇公故藏公遗像一纸，因取泐石。明季碑失而清复得，王邦镜康熙辛亥题识云：“祖龙一炬，三纪于兹，诸当事始谋复建之，而不能仿佛其遗容。畚鍤初施，忽得断碣一片，绘先生之像于上，兵燹之余，全躯具存。”此康熙重建草堂时所出土，即宇度所摹。后有康熙壬子据旧碑重摹本，金俊题识云：“掘地得石，则公之小像宛存焉，临摹既成，命诸剞劂。”即重刻何宇度摹本。“艺文”类收宇度及金俊《题少陵遗像》，即为此二碑而作。乾隆后刻石，自非明礼可见。一为《圣诗杜拾遗像》，左题“南轩裔竹桥张树勋”“南薰殿本、张骏犹龙抚。”传为光绪时刻。二《草堂图》，嘉庆十八年绘重修草堂全景二图，嵌于词壁及大廨西壁。三《放翁遗像碑》，道光壬寅陵文傑摹刻，题识云：“此三十一代祖务观公遗像也，江苏王君之佐刻

《笠屐图》供思陵龕中，杰补官震泽丞时，君以拓本见遗。”因重摹镌石。四《山谷遗像碑》，光绪间署成都知府黄云鹤摹刻，题识云：“云鹤世系，为公三十九代裔孙，变牒昭然。谨摹公像，立石座前。”

“艺文”记类十二首，赵次公《杜工部草堂记》为考草堂而作，宋注杜诗数十百家，蜀士赵次公《正误》，世称少陵忠臣。黄庭坚《大雅堂石刻村诗记》，因丹稜杨素刻杜两川诗于眉州而为之记，按本志之例应入“碑碣”。明以后文，多关草堂之修建。洪武癸酉蜀献王桩《重建草堂落成祭杜子文》称：寻其故址，衰草寒烟。方孝孺《草堂碑记》谓：建祠奉祀，左右为序。弘治庚申杨廷和《重修杜工部草堂记》：巡抚钟蕃、巡按姚祥为祠三楹，左右亦各三楹，引水通桥，祠后为书院。嘉靖丁丑

杜朝绅《存梅记》：成都知府邵经济建亭护梅。嘉靖辛丑巡抚刘大谟《草堂别馆记》：增修亭馆，“皆取诸少陵诗中之句”。万历时巡抚张时澈《重修杜工部祠堂记》，何志失收，有陈文烛《建工部浣花草堂记》，重修茅亭。及清草堂“榛莽瓦砾，一望凄迷”，康熙壬子重修，有楚蜀总督蔡毓荣、四川巡抚罗森二碑记，及学政周灿记，谓由李方伯重建，又有居都知府冀应态《重修草堂别馆记》谓：总叔佟伊重建，堂庑亭阁，规制大备。后代葺补，不改其制，以迄于今，犹存其旧。并以渭南伯。何志之后，乾隆己亥公裔杜玉林按察有《重修草堂碑记》。嘉庆壬申曹六兴《重修草堂碑记》陆子配享，杨芳灿有碑记。光绪甲申成都知府“为捐集杜祠祭祀基金、暨添祀黄鲁直先生立案文”碑记，凡此皆关草堂置建沿革之大者。

文献选录

文献选录